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選擇放棄還是堅持到底？經濟制裁中發起者縮手行為
的分析

Retreat or resolve: An analysis of sender capitulation in
economic sanctions

饒聆瑄

Ling-Hsuan Jao

指導教授：林竣達 博士

Advisor: Jiun-Da Lin, Ph.D.

中華民國 114 年 6 月

June, 2025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本論文係饒聆瑄(R11341039)在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114年5月29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林俊達

(指導教授)

✓ 吳文欽

✓ 魏健吾

蘇翊東

所長：

劉靜怡

誌謝



寫碩論真的是場漫長的旅程，歷經一年半的苦熬，如果沒有大家的陪伴與支持真的是難以支撐。首先，我最要感謝的是我的指導老師林竣達，感謝你不厭其煩地跟我討論、meeting，在我需要幫助時總是很快的回覆我的一百萬個為什麼，沒有你我想我的論文不會那麼快生出來。再來，我要感謝我的口試委員蘇翊豪、薛健吾、吳文欽老師，謝謝你們在如此繁忙的生活中還要撥冗來閱讀我的論文以及口試，也非常感謝你們給我的建議，讓我的論文品質能更加精進。其中特別感謝吳文欽老師，願意讓我參加寫作會議以及聽我報告論文，前者讓我的寫作效率大為進步，後者則給予我很多實用的建議，讓我能即時修改論文。

我要感謝台大曾經幫我上過課的老師，你們的課程都給予我養分讓我能夠寫出論文。我同時也要感謝在 ISSM 營隊曾經幫助過我的學員、助教和老師，沒有你們我想我的模型無法那麼快處理完。最後我要特別感謝我在中研院的老闆張廖年仲老師，感謝你時常督促我的論文進度，而且教我做研究的態度，還記得我碩一剛到中研院時我還不會自己尋找問題的答案，等到碩三時你終於在某天跟我說你終於會自己解決問題了，那時我真的覺得非常的感動。

同儕的部分，我要感謝 213、205 研究室的同學們，謝謝你們陪我一起聊天、吃飯、打球，讓我的研究生生活中充滿樂趣，大大減緩我的無聊與煩悶。其中我要特別感謝梁日彰、楊婕妤同學，謝謝你們常常陪我吃飯、運動，跟我聊學術相關的話題，讓我覺得在學術路上不感到孤單。感謝曾宇豪、全容生同學陪我一起到美國研討會探險，若不是你們，膽小的我應該是沒有那個膽子獨身到美國去。

最後我最要感謝的是我的父母與男友，感謝饒其中先生與林金霞女士從小到大對我求學路上的支持，如果不是你們金錢與情感上的支援，我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特別感謝男友林尚緯每天聽我抱怨，在我感到疲憊時帶我出去玩散心，在我感到迷茫時給予我鼓勵，同時用你的專業給我許多技術上的支援。要感謝的人真的太多太多了...千言萬語，欲說還休，期許未來我能帶著這些養分飛得更高、更遠，共勉之。

中文摘要



自中美貿易戰以來，經濟制裁作為歐美國家主要的對外手段引起國際社會關注，在烏俄戰爭中經濟制裁也居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經濟制裁的結果大致可以分為目標者妥協、發起者縮手、持續進行三種，至今為止有關經濟制裁結果的研究大多聚焦於目標者妥協，鮮少研究特別聚焦於發起者縮手；然而，發起者縮手並非制裁結果的少數。

令人費解的是，當發起者發動經濟制裁時，就注定會消耗一定程度的成本，而且如果隨意移除制裁將會對外釋放無法有效處理國際衝突，或是姑息破壞國際秩序行為的訊號，此舉會撼動發起者的國際地位，故本論文主要討論的研究問題是為什麼經濟制裁發起者要選擇縮手？什麼因素促使發起者傾向或不傾向縮手？

本論文針對歐盟主導、發起者(sender)政治競爭性、目標者(target)軍事上的國家能力等因素探討對發起者縮手的影響。研究發現成本考量是影響發起者縮手行為的關鍵，歐盟主導、發起者政治競爭性會影響發起者的縮手行為，目標者的國家能力則會部分影響。歐盟主導、發起者政治競爭性會使得發起者傾向於不縮手，而目標者軍事上的國家能力則會讓發起者傾向於縮手。在研究設計上，採用 IST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Termination) 經濟制裁資料庫作為研究分析對象，此資料庫包含 1950 年到 2018 年的經濟制裁，本論文將以無序多分類羅吉斯模型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MNL) 作為主要的統計模型，來分析會影響發起者縮手的因素。

本研究的貢獻有四：一、制裁結果的精確分類有助於剖析自變數對依變數的影響；二、資料更新，有別於使用傳統年代久遠的資料庫，本論文採取的 IST 資料庫能分析 2015 年後的經濟制裁；三、分析對象的增廣，本研究不只分析傳統上以單一國家為主的制裁，更增加國際組織制裁，讓制裁行為者更多樣化；四、補充既有研究的不足。據此，將有助於人們了解經濟制裁在國際衝突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實際效力與影響。

關鍵字：經濟制裁、發起者縮手、成本、歐盟、國家能力

Abstract

Since the US-China trade war, economic sanctions have become a key foreign policy tool for Western countries, drawing considerable atten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During the Russia-Ukraine war, economic sanctions have also played a central role. The outcomes of economic sanctions can generally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types: target compliance, sender capitulation, and ongoing. So far, most studies on economic sanctions have focused on target compliance, with little research specifically studying sender capitulation. However, sender country capitulation is not a rare outcome of sanctions.

What is puzzling is that when a sender imposes economic sanctions, it inevitably incurs certain costs. Moreover, lifting sanctions arbitrarily may send a signal that the sender country is unable to effectively handle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or to condon actions that undermin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Sender capitulation could undermine the sender's international status. Thus, why would a sender choose to capitulate? What factors make a sender more or less likely to capitulate? These are the key research questions of this stud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EU leadership, sender 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target military state capability influence sender capitulat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cost is the key factor that influence the sender capitulation.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EU leadership and sender political competition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likelihood of capitulation, while target military state capability have a partial influence. Specifically, EU leadership and sender political competition make the sender less likely to capitulate. In contrast, stronger target military state capability increases the likelihood of capitulation. The analysis draws on the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Termination (IST) dataset, which covers economic sanctions from 1950 to 2018. A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MNL) is employed to examine the determinants of sender capitulation.

There are four contributions in this study. First, the precise classification of sanction outcomes helps to better analyze the effects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on the dependent variable. Second, the use of updated data distinguishes this research from prior studies that rely on older datasets; by employing the IST dataset, this study is able to analyze economic sanctions imposed after 2015. Third, the scope of analysis is

expanded—this research includes not only traditional sanctions imposed by individual states but also those initiated b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reby capturing a more diverse set of sanctioning actors. Fourth, it addresses gaps in existing research. Taken together, these contributions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economic sanctions play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s well as their actual effectiveness and imp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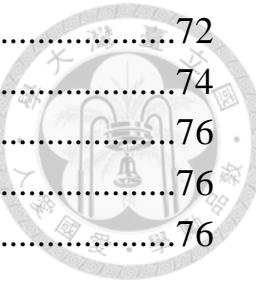
Keywords: economic sanctions, sender capitulation, cost, EU, state capacity

目次



口試委員審定書.....	i
誌謝.....	ii
中文摘要.....	iii
Abstract.....	iv
目次.....	vi
圖次.....	viii
表次.....	ix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問題與問題意識	2
第二節 研究論點與方法	3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貢獻	4
第四節 研究範圍	6
第二章 文獻回顧.....	7
第一節 經濟制裁的定義	7
第二節 經濟制裁的目的(goal)與效用(effect).....	8
第三節 經濟制裁成功的因素	17
第四節 發起者縮手行為的重要性	21
第三章 影響發起者縮手的因素	23
第一節 歐盟主導制裁	23
第二節 發起者政治競爭性	28
第三節 目標者軍事上的國家能力	30
第四節 其他因素	33
第四章 研究設計.....	39
第一節 研究架構	39
第二節 資料結構與來源	39
第三節 變數測量	43
第四節 統計模型	51
第五章 實證分析.....	54
第一節 描述性統計	54
第二節 模型分析	55
第三節 穩定性檢測.....	63
第四節 分析結果與討論	69
第六章 結論.....	72

第一節 主要研究發現與貢獻	72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74
參考資料	76
一、中文資料	76
二、英文資料	76



圖次

圖 1、經濟制裁不同成效案件數量.....	10
圖 2、經濟制裁成功案件比例.....	11
圖 3、經濟制裁成效案件數量與比例.....	12
圖 4、國際組織制裁數量.....	26
圖 5、國際組織制裁效率.....	26
圖 6、研究架構圖.....	39
圖 7、經濟制裁結果數量分布.....	44
圖 8、各發起者經濟制裁結果數量分布	44
圖 9、類別變數描述性統計.....	55
圖 10、歐盟主導預測機率圖.....	59
圖 11、發起者政治競爭性預測機率圖	59
圖 12、四種經濟制裁結果分布.....	61
圖 13、GSDB 資料庫四種經濟制裁結果分布.....	67

表次

表 1、美國經濟制裁的訊號昂貴程度表	35
表 2、經濟制裁資料庫比較	42
表 3、制裁結果編碼統整	45
表 4、變數操作定義、內容與資料來源統整	50
表 5、連續變數與二元變數描述性統計	54
表 6、Hausman test 檢定結果	56
表 7、三種經濟制裁結果的 MNL 模型	57
表 8、四種經濟制裁結果的 MNL 模型	62
表 9、兩種經濟制裁結果的 BL 模型	65
表 10、GSDB 資料庫三種經濟制裁結果的 MNL 模型	68

第一章 緒論

經濟制裁近年來逐漸成為世界各國為了達成其政治目的，用於脅迫他國的主流外交工具，尤其被西方用為鞏固世界秩序、宣傳民主價值。



以歐盟制裁幾內亞比索(Guinea-Bissau)為例，2010 年 4 月由於長期以來幾內亞比索政府與軍隊的利益衝突而爆發軍事政變，軍方拘禁政府參謀總長和總理，並在國內引發嚴重的破壞民主、侵害人權事件(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1)。歐盟於同年介入該事件，並依據《科托努協定》第 96 條，即當歐盟認為某協定簽署國未能履行尊重人權、民主原則和法治的義務，則應徹底審查有關情況，以尋求雙方均可接受的解決方案，要求幾內亞比索進行安全、司法部門等一系列的改革，並實行援助制裁(aid sanction)、旅遊制裁(EU Concil, 2011; European Commission, 2011)。由於幾內亞比索在 2015 年成功實施歐盟要求的部門改革，民主與人權狀況有所改善，歐盟因此撤銷對其制裁(EU Concil, 2015)。此案例顯示經濟制裁確實能成功促使目標者妥協，達成發起者的政治目標。

然而，經濟制裁有時非但無法讓發起者(sender)達成其政治目的，有時還會破壞兩國關係或讓該國人權、經濟狀況惡化。同樣以歐盟制裁為例，2003 年歐盟基於古巴長期以來對言論與政治自由的限制，對古巴實行長達五年的外交制裁，同時搭配美國的援助制裁和金融制裁(Attia and Grauvogel, 2023; European Commission, 2003)。然而，制裁並沒有有效改善古巴國內的政治情況與對政治犯的迫害，反而使得古巴人民陷於艱難的經濟狀態，2008 年歐盟廢除共同立場文件(Common Position)，即改善古巴人權狀態是歐盟與古巴恢復正常外交關係的先決條件，率先與古巴進入關係正常化協商(BBC, 2016; Stephens, 2014)。此案例說明經濟制裁並非都能達成發起者的政治目標，有時反而會讓發起者中途縮手，而究竟是什麼因素影響發起者選擇縮手或不縮手是本論文主要探討的研究問題。

本論文將在第一章緒論說明本研究的研究問題、研究論點、研究目的和貢獻與研究範圍，在第二章的部分闡述與經濟制裁相關的文獻回顧，第三章講述研究論點與假設，第四章說明研究設計，第五章針對研究結果進行解析，第六章對研究結論進行總結。

第一節 研究問題與問題意識

自從 2018 年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以來，經濟制裁議題再次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點。經濟制裁相關研究早在 1960-1970 年就已開始，代表人物是 D. Baldwin，由於二戰後國與國間的經貿交流越加頻繁，使得全球化成為大勢所趨，國家間互賴的加深使得讓國際強權有能力透過經濟力影響他國的行為，經濟制裁的概念也應運而生。

2000 年後西方以美國與歐盟為首與聯合國對於經濟制裁的使用變得更加頻繁，經濟制裁儼然成為軍事介入的首要替代方案，若國際衝突尚未嚴重至必須訴諸武力的程度，經濟制裁便是能打擊對方國內經濟狀況，同時向國際社會宣示自身不滿與決心的策略(Morgan et al., 2023)。從 2018 年中美貿易戰至 2022 年烏俄戰爭，經濟制裁在近期重大國際衝突中均扮演無法被忽視的角色。

經濟制裁的結果大致可分為目標者妥協、發起者縮手、持續進行三種，目標者妥協與持續進行按理而言理應是制裁結果中較常見的結果，因為經濟制裁的目的就是要逼迫目標者改變其政治行為，目標者若無法承受經濟損失便選擇妥協，若認為能繼續堅持制裁便會持續進行。然而，依據歷來的資料庫統計，經濟制裁結果中目標者妥協大概只占 40-50%，持續進行通常會在 20-30%，發起者縮手的結局大約占總體的 15-30%，若將持續進行視為尚未出現制裁結果，就已確定的制裁結果進行分析，發起者縮手顯然並非少數(Attia and Grauvogel, 2023; Morgan et al., 2014; Felbermayr et al., 2020)。換而言之，制裁發起者大約有 30% 機率會在發起制裁後選擇自動放棄。

舉例而言，美國在 2017 年時曾以蘇丹支持恐怖主義為由對蘇丹發動經濟制裁，然而卻在短短的一年就宣布解除經濟制裁。不只是蘇丹，美國對查德、伊拉克等涉嫌支持恐怖組織的國家也在 2017 到 2018 年間相繼實施制裁，卻在未達成果效的前提下，自行宣布放棄制裁。美國長期以打擊恐怖主義、推廣民主人權為由對許多國家進行經濟制裁，美國主動且快速地放棄制裁不僅造成目標者家更不懼怕來自美國的威脅，甚至讓目標者內的人權與經濟情況變得更加惡劣(Adam and Tsarsitalidou, 2019; BBC, 2018)。

令人覺得費解的是，發起者在發起經濟制裁時就注定付出一定程度的成本，先不論成本的高低，光是市場的轉移就具有潛在的交易成本，更不論若制裁對象是重要的貿易夥伴或大國。另外，由於西方長期將經濟制裁作為維持國際秩序、表態立場的主要工具，尤其制裁的目的往往涉及促進民主人權、結束戰爭，制裁的放棄不僅意味著犧牲曾經付出的成本，更代表立場的不堅定與沒有能力解決國際爭端，這對於最常使用經濟制裁作為維持秩序的發起者，無疑會造成名譽與地位的打擊，讓其霸權國的地位下降。

基於以上所述，本論文的研究問題是為什麼經濟制裁發起者要選擇縮手？什麼因素促使發起者傾向或不傾向縮手？儘管在明知撤銷制裁會讓已投入的努力付諸東流，同時讓發起者釋放無能解決國際衝突、軟弱不堅定的國際訊號，導致國際地位與信用受損，卻仍選擇放棄制裁。本論文將以發起者與目標者方的因素作為切入視角，探討當發起者與目標者具備何種特質時，會讓發起者傾向於縮手。

第二節 研究論點與方法

本論文認為「成本」是影響發起國縮手行為的關鍵因素，其中成本又能被分為政治成本與經濟成本兩種，經濟成本是制裁發起者選擇縮手或堅持制裁需要付出來自經濟層面的代價，而政治成本則是制裁發起者選擇縮手或堅持制裁需要付出來自支持者或他國政治層面的懲罰。

本研究根據成本對發起者縮手行為的影響舉出三個論點：

一、歐盟作為發起者會不傾向於縮手。雖然有許多研究指出有國際組織主導的多邊制裁會發揮出比單邊制裁更好的制裁功效，因為國際組織能有效組織與監督成員國的行為(Abbott and Snidal, 1998; Drezner, 2000)。然而，並非所有國家組織制裁都能發揮出多邊制裁的優勢，像是聯合國制裁自從 2000 年後由於成效不彰，數量上便持續下降；相反的，歐盟很大程度接替聯合國的位置成為實施制裁目前最有力的國際組織(Vines, 2012)；另外，其他區域組織的制裁的效力也不及歐盟(Early and Spice, 2015)。本研究認為歐盟基因於嚴格的監督機制與懲罰規定，當有成員國搭便車或背叛便會付出高昂的經濟與政治成本，不僅要承擔罰金更要承受來自歐盟的政治壓力(Giumelli, 2019)；如此，歐盟由於制裁成效較佳，

故當制裁發起者是歐盟時會比較不傾向於縮手。

二、當發起者內部政治競爭性激烈時會不傾向縮手。有研究指出政治領導者在面臨國內政治競爭或執政狀態不穩時，傾向使用經濟制裁作為鞏固政權的手段，因為制裁的使用會給領導者帶來有能力、強硬的形象，能吸引來自群眾的支持(Liou, 2024; McLean and Whang, 2014)。然而，先前的研究忽略發起者內部政治競爭性對縮手行為的影響。若發起者選擇輕易對制裁縮手會給支持者樹立缺乏能力的形象，進而流失內部政治支持，尤其在面對強烈的政治競爭時，來自支持者的懲罰便會轉換為高昂的政治成本，使的制裁發起者不傾向於縮手。

三、當目標者的國家能力越高，發起者越不傾向縮手。歷來有許多研究認為當制裁目標的經濟狀況越好，就越不容易對制裁妥協，因為目標者的經濟實力能有效抵禦來自制裁所帶來的經濟成本(Barber, 1979 ; Hufbauer et al., 2007)。然而，這並不能解釋為何經濟狀況並非如此良好的國家，如北韓、中國、伊朗對制裁不妥協的原因。本論文認為北韓等國家由於國家能力強盛，能有效調動國家資源並將經濟成本進行轉嫁，故對於經濟制裁的抵抗性較高，故當發起者認知到目標者的韌性後會選擇縮手。

本論文主要採用量化方法為主要的研究法，量化方法不僅能用數學統計佐證本文論點，更能普遍化論點的解釋力。由於本研究的依變數是制裁結果中的發起者縮手，為了對比自變數相較於其他制裁結果對發起者縮手的影響，本論文使用無序多分類羅吉斯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 MNL)作為主要的統計模型；如此，便能得知何種因素會導致發起者的縮手行為。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貢獻

本研究的目的有二：

第一，是彌補現行研究與理論的不足，長期以來研究的焦點多聚焦在經濟制裁的成效與目標者為何妥協，研究標的太過將重心放在制裁如何成功，而非為何失敗，這使得研究者通常只關注於目標者方面的因素，而忽略發起者方面的成因，以及目標者特質對發起者決策的影響。雖然現在已有一些關於發起者縮手的文章，然而這類文章較缺乏對於國際組織制裁的相關討論，國際組織目前為僅次

於美國最常發動制裁的行為者，國際組織制裁的成效與國際組織特徵對制裁結果的影響已成為重要的研究議題；另外，也缺乏探討目標者特質對發起者縮手所造成影響，中國、北韓等國家長期以來對於西方制裁具有高度抵抗力，然現有研究多採取質化個案研究的方式進行探討，鮮少有研究以量化的方式對於此類國家進行分析，本研究將依此做出理論上的補充。

第二，是以多種制裁結果視角進行切入，比較相同的變數對於不同制裁決策結果的影響，檢視相較於目標者妥協，發起者是否會呈現不縮手或者出現其他制裁結果，從而釐清變數之間複雜的關係。由此在解釋經濟制裁成效時，便能以一個更清晰、更全面的視角來分析，而不會忽略除了目標者妥協以外的其他制裁結果。

本研究的貢獻有四：

一、制裁結果的精確分類，本研究針對制裁結果採取較為精細的處理，相較於過往二元式的制裁結果，本論文將制裁結果分為三類與四類，準確的概括制裁可能會出現的結果，有助於釐清自變數對依變數的影響。

二、資料的更新，許多經濟制裁研究所使用的資料多限縮在 2014 年以前，距今已經有 10 年之久，國際環境已有許多變化，美國在這 10 年間與中國和俄羅斯等非民主國家的關係，已從潛在競爭關係轉向檯面上的敵對關係，故現今的全球制裁使用情形已與先前大不相同，本研究將使用更新到 2018 年的資料，有助於對於現行國際制裁的了解。

三、研究對象的增廣，本研究的特色在於發起者方不僅限於傳統的國家，而是將歐盟、聯合國與地區組織等國際組織納入分析對象，歐盟與聯合國是僅次於美國最頻繁使用經濟制裁的單位，對於兩者的研究已有不少，但多限於針對組織單獨的研究，沒有就組織間與單一國家制裁進行相互比較，以及國際組織領導人更替對制裁的影響，本研究將有助於認識不同行為者間制裁的區別和國際組織內部政治競爭所帶來的影響。

四、補充既有研究的不足，本論文使用理性成本考量的概念貫穿研究假設，探討發起者對成本的認知與考量對縮手行為的影響，不同於成本對於制裁結果影

響的傳統解釋途徑，本研究將成本區分為經濟成本與政治成本，以發起者間合作與發起者內部的視角來詮釋成本對於縮手行為的影響。

此外，為了補充既有文獻在國際組織和目標者特質對發起者縮手行為的缺口，本論文將國際組織細分為歐盟、聯合國、區域組織三類與單一國家制裁進行比較，用此方式證實不同種國際組織制裁的效力以及縮手行為的差異。發起者內部層面，本論文自行統整國際組織於制裁期間的領導人更替次數，藉此觀察國際組織政治競爭程度是否影響縮手行為。目標者特質方面，本論文提出以軍事上的國家能力作為解釋中國、北韓等國家對於制裁具有高抵抗力的原因，取代傳統上以目標者民主程度、經濟表現為主的測量方式，有助於研究非民主目標者對發起者縮手行為的影響。

第四節 研究範圍

本研究所使用的 IST 資料庫制裁發起者只包含美國、歐盟、聯合國、區域性組織四種行為者，故本論文的經濟制裁分析僅專注於西方主要制裁發起者所動的經濟制裁。另外，由於 IST 資料庫制裁僅包含實施階段的制裁，不包含威脅階段的制裁，故本論文的論點與研究假設只專注於解釋實施階段制裁的縮手行為，以上兩點為本研究的研究範圍。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經濟制裁的定義

當國家在實行外交政策意圖改變另一個國家的行為時，往往會採取許多不同的手段，像是軍事、政治、經濟等等，而利用經濟的方式使他國配合自身意圖以達成其政治目的被廣泛定義為經濟治略 (economic statecraft)，而其中又可細分為正向的措施和負向的措施：正向的措施像是關稅、補助、外援、投資保證、關稅偏好、外資等等，泛指發起者(sender)對目標者(target) 以經濟作為誘因的策略以實現發起者的政治利益；負向的措施則包含禁運、抵制、懲罰性關稅等等，指發起者以經濟性的懲罰來作為手段來要脅對象國(Baldwin, 1971, 1985)。

Barber (1979) 將經濟制裁定義為導向政治目標的經濟手段，Carter (1987) 則認為經濟制裁是一種經濟性的壓迫手段用來對付一個或多個國家，迫使其改變其政策，或至少用來展示發起者對於目標者政策的態度。Galtung (1967) 認為經濟制裁是一個或多個國際行為者 (sender) 針對一個或多個國際行為者 (target) 所發起的行動，其目的主要有二：一是通過剝奪目標者的某些價值來懲罰他們；二是促使目標者遵守發起者視為重要的特定規範。經濟制裁的政治性質在 Galtung 的研究中被分為懲罰 (punishment) 和遵守 (comply) 兩者，而遵守的重要性大於懲罰因為懲罰大多數時候並不能促使國家遵守，只能起到示範性功能。

Pape (1997) 對經濟制裁的定義進行較為細緻的分析，認為必須清楚區分經濟制裁、貿易戰、經濟戰 (economic warfare) 的名詞差異，經濟制裁是指藉由降低目標者的國際經貿往來迫使目標者政府改變其政治行為；貿易戰指的是透過經濟傷害作為要脅說服目標者接受其貿易要求，與經濟制裁不同處在於貿易戰並非要求目標者改變其政治行為，而是改變其經濟政策；經濟戰則是尋求削弱對方的經濟潛力以削弱對方的軍事能力，前面兩者並未以削弱對方軍事作為目標。然而，此種分類方法顯然無法清楚劃分經濟與政治目的，以及說明政策是出於純然的經濟或政治的目的；例如，2018 年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時，雖然是出於中國長期以來的貿易順差，但更深層反映美國想壓制中國的崛起。另外，當目標者面臨經濟制裁時，內部經濟受到的損害可能同時讓軍事發展受損，如此便難以區

分發起者究竟是出於改變其政治行為或削弱其軍事能力。

而在 Baldwin 研究語境之下，經濟制裁更傾向於對於負向經濟治略的廣泛性代稱，既包含政治目的又包含經濟目標，並沒有像 Pape 試圖做出細緻又複雜的分類，而目前學界大多仍是以 Baldwin 的定義為主要的名詞解釋，而本論文也將採用此定義作為劃分是否為經濟制裁的主要判斷標準。

另外，隨著冷戰結束後世界各國對於彼此的經濟互賴加深，國家間利用經濟作為工具來達成其政治目的的方法也與以往有所不同，其中以中國作為代表者，新一代的學者認為在創新經濟做為國家安全的框架下，國家特別重視科技轉移、創新網絡和經濟政策的外溢，經濟治略應該要有一個更加廣泛的定義跳脫傳統以政治、軍事為目的的策略，稱為新經濟治略 (new economic statecraft)，而經濟制裁、產業政策、標準政策、貿易政策則作為旗下主要的策略工具，經濟制裁的重要性在中美競爭的背景下被大大強調，用於鞏固國家創新能力和國家安全 (Aggarwal and Reddie, 2020; Cheung, 2017; Kennedy and Lim, 2018)。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經濟制裁作為無硝煙的戰爭 (short of war) 頻繁地出現在國際間。有別於自由主義所提倡國家間的經濟互賴將有利於國際和平，位於經濟網路中心節點的國家開始利用不平等的網路關係脅迫他國，即互賴武器化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為經濟制裁提供一個新的解釋途徑 (Farrell and Newman, 2019)。

第二節 經濟制裁的目的(goal)與效用(effect)

一、經濟制裁成效的樂觀論點

經濟制裁的目的和效用一直都是學界爭論多年的議題，學者們長期辯論的方向從質疑經濟制裁作為工具對於國家達成政治目的的效果，衍伸到依據效用的高低推論制裁的真正目的，即若是經濟制裁對於改變他國行為的成效不高，在經濟制裁有損害本國經濟發展的風險下，國家為何還要使用經濟制裁？對於經濟制裁的成效學界大致分為兩派，分別是：一、經濟制裁作為經濟制略的重要工具仍然對影響他國行為具有影響力，經濟制裁的政治目的仍以嚇阻 (deterrence) 和脅迫

(coercion) 為主；二、在經驗研究下，經濟制裁的成效不彰，制裁的目的可能並非在於改變他國的行為，而是以象徵性、輔助性目的為主，像是展示國家的決心的昂貴訊息 (costly signal)，或是軍事行動的輔助策略。

對於經濟制裁效能持樂觀看法的學者認為經濟制裁能成為國家間軍事衝突的替代選項。Hufbauer et al. (1990) 透過研究 1914 到 1990 年的 115 個案例發現其中 40 個案例是成功案例，有高達 34% 的成功機率，Hufbauer et al. 將結果細分為四個層級，分別是失敗結果、不清楚但可能是正向的結果、正向且部分成功結果和成功結果。然而，此研究結果中有 18 起案件目標者的退讓是在發起者採取軍事行動之後，並不能有效說明目標者的妥協是源自於經濟制裁；同時，效果不清楚的經濟制裁可能使研究者高估經濟制裁的效力 (Pape, 1998)。

Cortright and Lopez (2000) 探討 1990 年代 12 個聯合國制裁案例來分析經濟制裁的效力，發現經濟制裁在迫使國家改變行為去遵從發起者目標的成效比想像中要高。在 12 個案例中有 4 個（伊拉克、南斯拉夫、利比亞、柬埔寨）得到中高程度的成功；4 個僅導致目標者在短期內願意重回談判，對長期的改變政治行為沒有助益（海地、安哥拉、塞拉利昂、索馬利亞）；其餘 4 個則完全失敗（蘇丹、賴比瑞亞、盧安達、阿富汗）。伊拉克和南斯拉夫是最為成功的兩個案例，其共同特徵是制裁層面最全面、程度最嚴厲、時長最久。此研究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 Hufbauer et al. (1990) 經濟制裁成功率具有 30 % 左右的觀點，但由於案例數量不多，且沒有充分解釋案例選擇標準，此結論的解釋力有待驗證。

於是有些學者開始使用量化方式檢驗經濟制裁成效。Morgan et al. (2014) 針對經濟制裁效力低落的論述持反對的看法，認為早年大多數的研究皆是利用案例研究的方式，藉由挑選執行很久且不見效果的案例來以偏概全的認為制裁作為政策工具是失敗的。Morgan et al. 使用 TIES (Threat and Imposition of Economic Sanctions) 資料庫以量化的方式來分析經濟制裁的有效性，針對從 1945 年到 2005 年蒐集的 1412 筆案例依據目標者是否妥協作為成功的定義，並將成功劃分為最嚴謹、協商妥協 (negotiated settlement)、妥協占比 (settlement nature) 三種。最嚴謹的成功定義為目標者完全或部分遵從於發起者改變其政治行為；協商妥協是較為寬鬆的定義，規定但凡是制裁重啟協商後的妥協都被列為成功；妥協占比是依

據事後的分析發起者的目標在案例中被實現的比例而定。研究結果發現在將成效不明案例移除的前提下，最嚴謹的成功率有 37.5%，協商妥協的成功率高達 56.3%，而妥協占比的成功率為 44%。

近年來，隨著資料的更新和增補對於經濟制裁果效的測量方法更為細緻和多元化。Morgan et al. (2023) 分析最新的經濟制裁資料庫 Global Sanctions Data Base (GSDB)，發現從 1950 年到 2022 年經濟制裁的使用率有上升的趨勢（見圖 1）。根據資料庫的定義，完全成功指目標者完全接受發起者的要求，部份成功指目標者部分接受發起者要求，失敗定義是當初發起者的目的不但沒有實現，有些反而還更加惡化，發起者在沒有達成目的的前提下將制裁移除(Felbermayr et al., 2020)。在政治目的成功率上，自從 1990 年後有明顯上升趨勢直至 2013 年趨勢減緩，2016 年時成功率再次上升到川普任內再次下降，但比較有可能的原因在於川普時期經濟制裁的案件數激增，由於案件過新許多資料尚處於結果未定的狀態。2000 年後經濟制裁的成功率大致維持在 50 % 以上，若是將部份成功的案件加入經濟制裁的成功率可達 60 % 以上（見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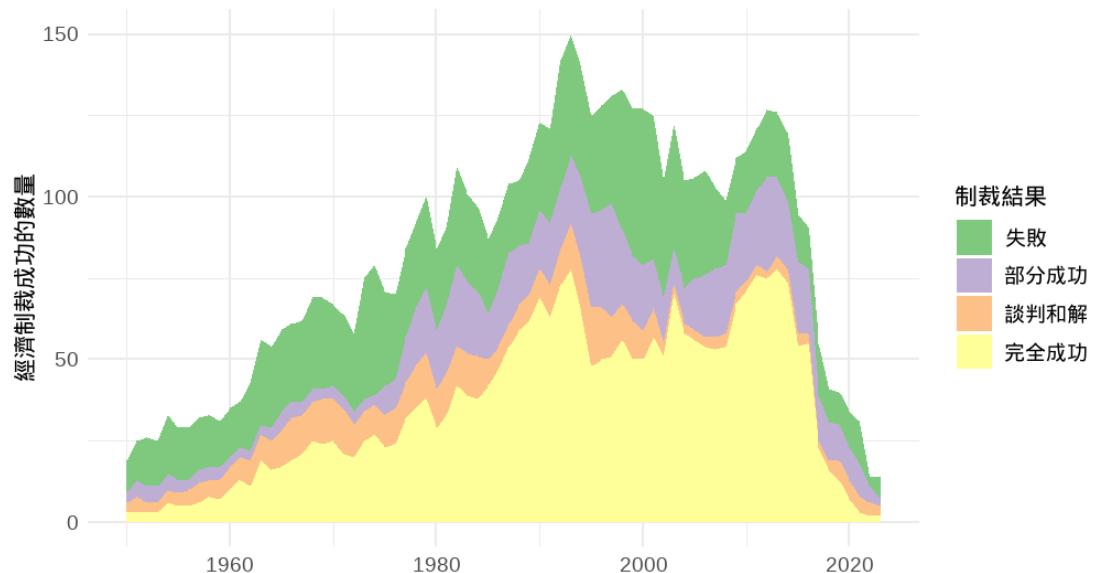


圖 1、經濟制裁不同成效案件數量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 Morgan et al. (2023) 分析用 GSDB 資料庫重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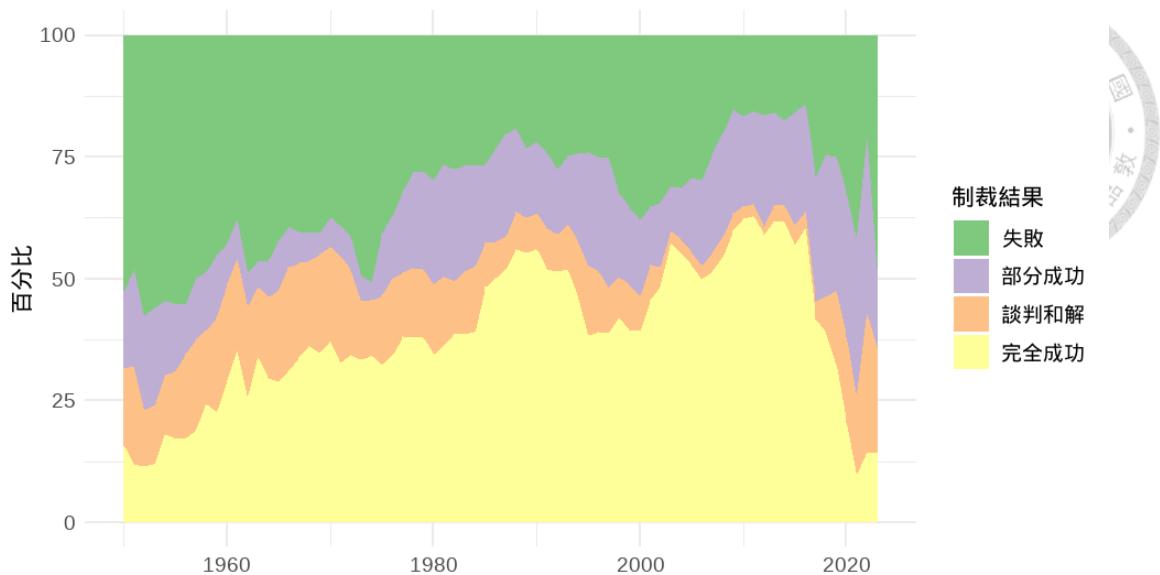


圖 2、經濟制裁成功案件比例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 Morgan et al. (2023) 分析用 GSDB 資料庫重繪

Attia and Grauvogel (2023)所編纂的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Termination (IST) 資料庫也得到類似的結論，此資料庫的時長橫跨 1950-2018 年。目標者制裁結果中完全妥協的定義是目標者完全接受發起者要求並轉化為行動；目標者部分妥協是目標者仍持續進行其具侵略性行為，但部分接受發起者要求並部份改變其行為；發起者縮手是即使目標者不接受發起者的要求，發起者仍選擇放棄制裁。據本論文統計，在部分妥協被列為成功的條件下，經濟制裁的成功率高達 72%，若是採取嚴謹的定義僅完全妥協才能被列為成功，經濟制裁的成功率仍有 36%，顯示資料越靠近現代經濟制裁的效力有越高的趨勢（見圖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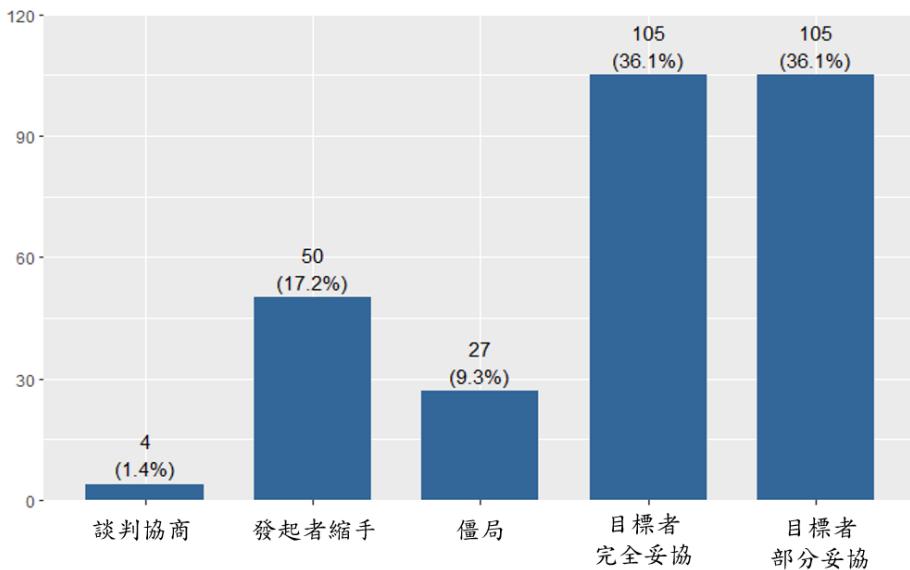


圖 3、經濟制裁成效案件數量與比例

說明：此圖並未將持續進行納入統計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統計 IST 資料庫所繪製

另外，有些學者則認為將成功與否的標準列為目標者是否改變其政治行為太過狹隘。Baldwin (1998) 認為在定義所謂效力時，不能單純只是藉由目標者是否改變其政策行為而將效力的計算二分法為成功和失敗，而是要納入多層次的分析才能解釋為何政治領導人對於經濟制裁的使用不減反增的現象。成本往往是學者在分析經濟制裁成效時所忽略的重要因素，經濟制裁能成為軍事衝突的有力替代方案是因為通常軍事脅迫行動經常伴隨經濟制裁，而投入經濟制裁的成本本可以被全部投入於軍事，並非完全放棄軍事行動改為經濟制裁才能說明經濟制裁是軍事衝突的替代方案。一個成功的政策需要最大化政策制定者的效用，即利益與成本間的平衡，所以並不能說目標者沒有在最重要的部分進行妥協就代表經濟制裁失敗，但凡是讓目標者因為不服從所付出的成本高於其獲利都應被重新定義其效力；更何況對領導者而言，經濟制裁的目標亦可能是支持戰爭、懲罰目標者等其他因素(Baldwin, 2000)。

二、經濟制裁成效的悲觀論點

對於經濟制裁抱持悲觀看法的學者最早為第一波以案例研究(case study)為主的經驗性分析。Galtung (1967) 以聯合國針對羅得西亞（今辛巴威）內戰進行

經濟制裁；然而被制裁方透過南非走私大量物資與軍火成功突破資源限制，得以繼續進行內戰，而 Doxey (1972) 的案例研究也得出制裁失敗相似結果。Schreiber (1973) 以美國針對古巴和多明尼加的經濟制裁案例為主來分析，認為經濟制裁是否有效決定於軍事與外交政策的搭配，經濟制裁本身的效力備受限制，比起改變對象國的政治行為，經濟制裁本身的象徵性作用更強，能很大程度用於凝聚國內或國外的支持。以上早期經濟制裁代表性事件的案例研究，皆指出以改變對象國政治行為為導向經濟制裁沒有辦法達到預期的效果，假設制裁的象徵性功能大於實質意義。

Barber (1979) 將經濟制裁的目的分為三項不同目標：第一種目標是改變他國的行為；第二種目標是鞏固發起者的名譽，展示國家的意願和能力給國內和國際的聽眾看，屬於象徵性的目的；第三種目標是發起者要確保國家的行為符合國際體系的規範與秩序，防止國家做出破壞既有國際結構的行為。Barber 在文中僅針對各個目標舉出例子佐證，並未就三個目標進行比較。之後 Lindsay (1986) 對三個目標舉出 19 個案例進行檢視後，發現：一、目標為遵從、顛覆或嚇阻的制裁通常結果失敗，但制裁在作為國際和國內象徵時卻極具吸引力；其次，制裁通常會強化目標者的行為，讓發起者喪失對目標者未來經濟施壓的影響力；第三，如果經濟制裁目標為追求國際和國內象徵通常會削弱第一種類的目標。然而，Lindsay 的文章並沒有清楚解釋選擇案例的標準，若單就 19 個案例看經濟制裁最能達成什麼目的不免有所失準。

上述經濟制裁的支持者有一部份是透過大數據的量化方式來論證經濟制裁的效力，然而此種看似證據力充足的論述仍遭受到反對學者不小的挑戰，其中早期最具代表性的反對派學者 Pape (1997) 針對 Hufbauer et al. (1990) 所提出的第一波量化研究提出質疑，認為 HSE 資料庫所舉出的案例若仔細檢驗會發現在判斷是否成功的標準上有許多模糊之處，經濟制裁的成功率實際上只有 6%，在研究中判定 40 起成功的案件中只有 5 個案例是明確成功，其餘的均是成效模糊不能被列為成功案例；同時，Pape 認為經由軍事或外交脅迫下而成功的經濟制裁不能被計算為成功案件，因為沒有辦法釐清其效力究竟是出於經濟制裁本身還是遭受軍事壓力所帶來的額外效果。

Van Bergeijk and Siddiquee (2017) 則是針對大型資料編纂的方法論提出質疑，認為許多學者雖然透過蒐集大量經濟制裁以實證和數據的方式說明其效力，但在方法論上卻缺乏透明性。例如 HSE 資料庫經歷過三次改版，在最新的 2007 的版本中，並未收錄第二版中的所有案例，同時將制裁效力和目標的標準進行挑整，使得經濟制裁能被判斷為具有貢獻性的比例大幅提高，具有小貢獻的制裁在第三版本中高達 52%，而制裁目的的分類也出現顯著的調整，且並未清楚說明刪減和增加特定案例的具體原因。其中針對經驗性量化研究的最大批評為看似客觀的數據，會因為研究者對判定的修改而大大影響其研究結果，降低其客觀和可信度。

經濟制裁的輔助效果亦是此派學者論述中所強調，將經濟制裁當作常見配合軍事和外交的輔助工具，用經濟手段支持目標者反對派以及對其盟友和國際組織施加壓力，以惡化被制裁國的處境，以達成發起者的目標。因此，若是僅依靠經濟制裁來達成政治目標將會贏來極高的風險 (Marinov, 2005)。政治層面上，經濟制裁時常不能有效讓目標者改變其政策，有時反而還會讓目標者領導人藉機凝聚國內支持；經濟層面，發起者在發動制裁時其進出口能力容易遭受到損害，除非發起者本身擁有強大的經濟能力與國際地位，並與對象國本身處於不對等的經貿關係，方能有效控制發動制裁成本；另外，發起者還需要承擔目標者採取以第三方市場替代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以及目標者和其盟友發動的反制裁策略報復 (Forrer, 2018)。

反對經濟制裁效力的研究中，亦存在以大型經驗數據為主的研究。Biersteker et al. (2018) 以聯合國為經濟制裁發起者建立 Targeted Sanctions Consortium (TSC) 資料庫，蒐集自 1990-2013 聯合國針對不同對象國發起多邊制裁的資料庫。此資料庫有別於 HSE 和 TIES 將經濟制裁的目的細分為脅迫、限制、訊號三項，發現平均而言經濟制裁的成功率有 22%，其中脅迫目的占比最高成功率只有 10%，而限制目的和訊號目的的成功率卻有 27%。制裁在達成強迫他國實行、改變政策的效力不高，但在限制他國不要實施特定政策上有其特定效果，在發送、傳遞訊號層面效果顯著，顯示制裁的採用更有利於發送發起者的決心，對於改變對象國的成本效果不大。

在反對派中，佔據經驗性研究最大宗的方法論仍是案例研究，與早期不同的是近期研究比較關注經濟制裁在對象國經濟上造成得損害與社會發展不利的影響，並強調雖然對象國遭受嚴重經濟損失，但是經濟制裁並沒有改變對象國政策方向。Oxenstierna and Olsson (2015) 指出雖然俄羅斯在一系列克里米亞半島事件中遭到來自西方的嚴重制裁，讓其經濟受到損害，但並未影響俄羅斯針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Chen (2017) 也說明雖然經濟制裁讓北韓經濟受到重創但並未有效讓其改變政策方向，因為西方制裁多針對北韓的政治菁英進行打擊，並未針對北韓整體進行經濟制裁，使得經濟制裁在製造政府壓力方面並不成功，西方本身低估政府分配資源的能力，且無法有效掌握北韓政府的收入、金流來源，導致經濟制裁非但不能有效嚇阻其核武計畫，更讓領導者用於激起國內的民族主義。

Drezner (2022)舉出兩起美國實施大規模全面制裁但最終以失敗告終的案例，分別是 1990 年 2003 伊拉克制裁和 2018 年伊朗制裁，這兩件制裁雖然都讓目標者承受巨大的經濟壓力和民生凋蔽，但仍沒有讓目標者因此而服從發起者的要求。伊拉克事件中，美國要求伊拉克歸還科威特資產、土地以及交出化學、生物、核能研究計畫，即使海珊早在 1990 年代便終止研究計畫仍拒絕服從美國的要求改變其政策。伊朗事件中，川普上任後認為歐巴馬時期與伊朗簽訂的 JCPOA 協議無法有效約束伊朗的行為，於是自行退出該協議並恢復對伊朗的全面性經濟制裁，美國重新對伊朗提出 12 項要求，其中 8 項與核武的發展無關，皆是要求伊朗改變其對外行為，例如停止干預伊拉克與敘利亞、停止對非國家武裝組織的支援等等。然而，伊朗在經濟的重壓下，不但重啟核武開發計畫，其外交政策也沒有明顯改變的證據。

Drezner 認為失敗的原因有二：一、威權國家能夠將經濟制裁帶來的傷害轉移到國內的弱勢族群或一般平民身上，有研究指出伊拉克在制裁過後孩童的死亡率明顯上升；另外，伊朗在經歷經濟浩劫後，國內人權情形明顯下降，大規模的暴動讓政府與社會的關係十分敏感，貪污和地下經濟有增無減，看似針對菁英階級的金融制裁實則對大眾社會產生巨大衝擊(Barbara, 1995; Dursun and Drury, 2010; Lori et al., 1998)。二、美國提出的要求議題大多牽涉到對象國核心利益，且範圍廣泛、條件多，讓目標者不容易遵守。美國在這兩起案例上不但沒有達成

其目標，還引發一系列外部負面效應，可謂雙輸的結果。

距今最近的大型經濟制裁為 2023 年美國與歐盟針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所進行的經濟制裁。在此次制裁中，西方似乎視經濟制裁的輔助性大於其威脅或嚇阻效用，因為西方在一開始設計制裁時，為了防範發起者本身承受通貨膨脹、國內民意壓力，針對俄羅斯出口主要商品石油、天然氣、煤炭、肥料、鈾和小麥出口設置了重大例外，導致經濟制裁無法即時的給予俄羅斯經濟重創發揮嚇阻的效果。雖然俄羅斯的經濟並沒有如預期的打擊，只有-2%的溫和衰退，但制裁還是發揮關鍵的阻礙效果；例如，透過 SWIFT凍結俄羅斯的海外資產和外匯存底讓俄羅斯無法大量採購資源，以及封鎖武器供應商對俄羅斯的直接進口，讓俄羅斯需要付出高昂交易成本才能取得軍火，有效拖緩其軍事行動。雖然經濟制裁並沒有達成阻止俄羅斯軍事行動，但仍起到輔助作用，即使效用部分被俄羅斯的經濟政策和中國與印度的支援抵銷(Schott, 2023)。

三、有關經濟制裁成效的其他論點

另外，學界從制裁成效的爭論發展出論證其象徵性功能的途徑，即經濟制裁作為發送訊息(signal)的主要手段。立基於理性選擇理論，國家領導人在考量決策時會理性選擇最能獲得群眾支持的決策，即與最初所發布的政策、承諾(commitment)最相符的決策，若是最後的政府行動與當初的承諾不符領導人則會付出高昂的聽眾成本，即國內的民意支持下降或國際的批評；總體而言，付出越高代價做出的承諾可信度就越高，國家以此會將付出成本作為政策依據傳遞對於特定議題的重視(Fearon, 1995; Quek, 2021)。制裁作為一種國家對外行為可用於傳遞國家對於對象國的態度與決心，可以制裁誘導目標者的行動或配合發起者的目標(Biersteker, 2015)。

國內學者蘇翊豪 (2022) 使用聽眾成本理論來詮釋經濟制裁的目的，認為美國將經濟制裁使用為對外傳達訊息的重要政策工具，依據制裁使用的官方口吻和目標對象不同對美國政府的拘束力會有高低之分，由低到高分別是從沒有特定針對的制式公告、目標者企業、目標者政府，不同的制裁被當作訊號以不等的成本釋放出去，傳達美國政府對於該事件、政策程度不一的決心和態度。越是清楚、

直接針對目標者領導者和政府的制裁耗費成本越高，目標者會根據不同程度的昂貴訊號改變其行為，這也解釋為何在許多學者認為經濟制裁效力不彰的前提下，小布希、歐巴馬、川普三個時代使用經濟制裁的頻率有增無減(Felbermayr et al., 2020; Morgan et al., 2023)。

本論文認為雖然經濟制裁成效的正反方均以案例研究、量化統計試圖論證自身的觀點，但最大的爭點仍是流於究竟要符合什麼樣的標準被視為「成功」？若是依據 Pape 的定義將成功定義為目標者改變其政治行為，那正方的論證還是趨於不足，雖然正方可以用大數據說明 40-60%，但無法否認的是有更多是成效模糊的案例，加之近年來歐美頻繁使用經濟制裁，但用於不論是北韓、中國、伊朗、俄羅斯等威權國家均收效甚微。然而，若是將制裁成功的定義放寬，將象徵性、輔助性或經濟性的目的列為評斷成功與否的標準，只追求讓目標者的成本大於利益或發起者的利益大於成本，那制裁無疑是有果效的，而這也是國家領導人樂於使用經濟制裁的原因。

第三節 經濟制裁成功的因素

至今，學界對於經濟制裁的有效性仍充滿爭議，有關經濟制裁的目的更是依據學者對於制裁效力的看法而有不同的解讀，研究的方向逐漸轉往經濟制裁終止行為成因的研究。經濟制裁終止(termination) 通常分為兩個層面：發起者方、目標者方。發起者方的制裁終止一般稱做發起者縮手(sender capitulation)，指目標者在未達成發起者所設立解除制裁條件的前提下，選擇撤銷經濟制裁；目標者方的制裁終止一般成為目標者妥協(target compliance)，指目標者在達成發起者所設立解除制裁條件前提下，發起者依約解除經濟制裁(Grauvogel and Attia, 2020)。目前學界大部分的研究著重於目標者方的制裁終止行為與其成因，即究竟什麼因素更容易讓目標者妥協？本論文將成因分為五種類型分述：

第一種類型的比較對象是多邊制裁(multilateral sanctions)與單邊制裁(unilateral sanctions)。多邊制裁是多個發起者一起針對一個目標者發動經濟制裁；與之相反的，單邊制裁為單一發起者對目標者的制裁。大多主流的研究認為多邊制裁基於會讓目標者付出相對於單一制裁更高昂的成本，以及讓目標者難以

尋找到第三國市場來彌補被制裁所帶來市場的限縮，而比單邊制裁效力更高，更容易讓目標者妥協(Early, 2021; Morgan et al., 2023; Peksen, 2019)。另外，國際組織的加入有利於將經濟制裁制度化，讓發起成員國不敢輕易地違背制裁命令自行與目標者建立經貿關係，防止搭便車與投機者行為(Bapat and Morgan, 2009; Early, 2015; Early and Spice, 2015)。

Weber and Schneider (2020)則更進一步分析多邊制裁與單邊制裁在威脅與執行階段的效力，通過比較歐盟和美國的制裁後發現，在威脅階段單邊制裁效力比多邊還要高，但在執行階段多邊效力明顯比單邊高(Bapat and Morgan, 2009)。雖然相較於歐盟，美國的領導人需要直接受到來自民意的考驗，若是領導人沒有實踐制裁的承諾將會承擔國內的不滿，即較高的聽眾成本。相對的，而歐盟並不會直接承擔來自民意的懲處，由於其經濟制裁的實施需要多數成員國代表的同意，若歐盟的讓步與當初的承諾不同則可輕易歸咎於不投贊同票的成員國。然而，在實施階段歐盟的制裁卻比美國有效力，一是目標者的替代第三市場選擇下降；二是移除制裁的門檻較高，同樣需要多數成員國的同意。

第二種類型是發起者和目標者經濟合作與政治聯盟關係。相較於發起者和對象國之間傾向敵對或競爭關係，若兩者間本身存在盟友關係，經濟制裁的效力將會明顯大於敵對關係。因為若兩者是盟友關係，目標者會更傾向為了恢復以前的合作與害怕損失國防安全的保障而選擇妥協；若兩者是敵對關係，目標者會基於退讓後所損失的國際聲譽或國內壓力，以及預期未來可能再次面對來自發起者的經濟施壓而傾向不退讓(Drezner, 1999; Whang, 2010)。薛健吾（2021）透過分析TIES 資料與全球化指數(KOF)後發現，政治連結程度越高的目標者越傾向對制裁讓步，而經濟連結度、社會連結度與目標者讓步並無顯著相關。

多數理論預期發起者與目標者具有高度經濟互賴、不對等互賴將會讓目標者基於面臨較大的經濟壓力而選擇退讓(Farrell and Newman, 2019)。然而，許多研究發現高度的經濟互賴與目標者是否選擇退讓並沒有直接且顯著的關聯，因為目標者有可能基於盟友的支持、轉移市場到第三方或經由非正式管道貿易，而將經濟成本與風險降低(Peksen and Jeong, 2019; Peksen and Peterson, 2016)。發起者雖然會傾向於向對其貿易依賴高的國家發起制裁，但此期望會隨著發起者對目標者

尋找第三方替代市場的能力而遞減，而第三方替代市場的選擇會受到目標者與第三國是否具有政治聯盟關係而影響，較不會受到發起者與第三方國家經濟或政治合作的影響；舉例而言，烏俄戰爭中西方對俄羅斯發起廣泛的經濟制裁，但是俄羅斯利用加大對中國和印度的出口來大幅降低經濟損害，雖然美國和印度近年有軍事合作，但俄羅斯和印度、中國自蘇聯時代以來已有深入的國防安全合作，故西方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一直沒有取得顯著的成效(Jena et al., 2024)。

第三種類型是經濟制裁的政策目標，政策目標達成的難易度、性質與目標者是否會選擇妥協息息相關。通常對於比較沒有涉及到目標者核心利益的經濟制裁，目標者比較容易妥協，像是釋放政治犯(Hufbauer et al., 1990)。在 GSDB 的資料中，成功率最高的經濟制裁目的分別是促進民主、促進人權和結束戰爭；成功率最低的經濟制裁目的是動搖政權、阻止領土爭端和阻止恐怖主義(Morgan et al., 2023)。與動搖政權相關的經濟制裁有時非但無法達成其果效，反而會讓目標者的民主與人權下降，因為目標者反對派會認為領導人勢力被削弱從而引發更多反抗，促使領導人以更加殘忍的手段壓制反對派(Lucena and Apolinário Jr, 2016)。

第四種類型與經濟制裁的時間階段相關，學者們發現經濟制裁相較於執行階段，在威脅階段成功的機率較高；也就是說，大部分會因為發起者的脅迫而妥協讓步的目標者，早在威脅階段就會接受發起者的要求，而非等到經濟制裁已經執行讓本國利益受到損害後再進行妥協(Marinov, 2005; Whang et al., 2013)。另外，有研究發現單就經濟成本而言，威脅階段所遭受的損害有可能比執行階段還要嚴重，外資的撤離在威脅階段最為明顯，但此影響會隨著制裁執行的時間而逐漸下降，因為第三國市場與投資會遞補原先的空位(Biglaiser and Lekszian, 2011; Lekszian and Biglaiser, 2013)。

Walentek et al.(2021) 進一步分析影響威脅階段成功率的因素，提出三個假設：一、脅迫假設，目標者基於對於經濟成本的預期而選擇對發起者的假設讓步；二、資訊假設，目標者和發起者外交的親近性會影響到目標者妥協的程度，兩者間的軍事、政治聯盟越緊密，目標者妥協的可能性越高，因為有堅固外交關係的國家在發出訊號時所表達的決心有較高的可信度，而此結果也呼應上述盟友關係對經濟制裁效力的研究；三、公共承諾假設，民主國家所發出的威脅由於在國內

必須承擔較高的聽眾成本，其威脅可信度較高，故目標者因此而妥協的機率越高。結果驗證第一和三假說，威脅階段的制裁基於預期成本和聽眾成本成功率會更高，且比執行階段還高。

第五種類型是針對性制裁(targeted sanctions)與全面性制裁(comprehensive sanctions)。針對性制裁指的是發起者針對目標者的特定產業、組織、行為者實施制裁；全面性制裁是發起者對目標者經濟全面性的制裁，沒有特定的針對對象或手段。針對性制裁的出現源於 1990 年代學界與政策界對於經濟制裁效力的檢討，認為全面性的經濟制裁不但沒有辦法達成預期效果，還會波及到無辜的人民，無法做到有效精準打擊(Lektzian and Souva, 2009; 蘇翊豪, 2022)。然而，目前並沒有強而有力的證據支持針對性制裁的效力高於全面性的制裁(Biersteker et al., 2016; Drezner, 2011)，因為目標者政府仍然可以策略性保護針對性制裁的對象，並且調動國內資源於特定群體或組織，同樣使非目標對象受到傷害，針對性制裁的成效未來恐需要更多檢驗(Ahn and Ludema, 2020)。

雖然針對性制裁的成效未必比全面性制裁強，但他有許多潛在優勢，像是具備較高的機動性，可以依循兩國狀況做政策性調整(Biersteker and Hudáková, 2021)。另外，金融制裁是針對性制裁中成效最顯著的工具(Rosenberg et al., 2016)，目前被廣泛運用於歐美的經濟制裁中，例如 2012 年歐美共同利用 SWIFT 制裁伊朗，以及 2020 年歐美透過 SWIFT 拖緩俄羅斯進攻烏克蘭的攻勢。在 GSDB 資料庫的統計中，金融和軍事制裁名列最有效制裁種類的前兩名。然而，也有不少研究指出金融性制裁為目標者帶來負面影響，導致其人權與民主狀況倒退(Adam and Tsarsitalidou, 2019; Biersteker et al., 2016)。

第四節 發起者縮手行為的重要性

目前學界探討經濟制裁終止的研究繁多，但研究依變數多限縮於制裁終止時間長短、目標者妥協、成功率高低等，鮮少有將發起者縮手單獨特別提出討論的研究；實際上，許多量化研究顯示來自目標者方的終止僅占 40-60%，意味著扣除僵持和重新協商等少數案件，發起者方的終止並非制裁終止結果的少數 (Hufbauer et al., 1990; Morgan et al., 2014, 2023)。而其中以目標者妥協作為依變數的研究佔大宗，忽略比例不低來自發起者方的終止制裁，而且不妥協有時並不意味著發起者縮手，有可能是其他制裁結果。

以制裁終止時間長短作為主要分析對象的研究有 McGillivray and Stam (2004)將制裁終止時間的長短作為依變數，分析與領導者變換之間的關係；Bolks and Al-Sowayel (2000)分析制裁時間長度與目標者民主程度、政治穩定性間的關係；Early (2015)探討政治結構穩定度與回應策略如何影響制裁的時間；Attia and Grauvogel (2023)將制裁設計與制裁是否存在做測量與分析。此類研究將經濟制裁的所有結果當作一個整體，沒有細分終止究竟是出於目標者妥協、發起者縮手，抑或是雙方協商，將無法有效區分因果機制。以 McGillivray and Stam 的研究為例，發起者領導者更換有可能導致發起者的政策更換讓發起者縮手，或讓目標者的態度出現轉變而選擇妥協，若是將制裁終止清楚區分便能有利於建立其中的因果機制。

學界對於發起者方的縮手行為雖有研究，但數量不多且較集中於 2000 至 2010 年之間；例如，Dorussen and Mo (2001) 粗略將經濟終止區分成單邊移除、目標者退讓、雙方同意三種結果，並以此來測量三種結果與聽眾成本、尋租間的關係，由於此研究使用 HSE 資料庫，而該資料庫對於每筆制裁的最終結果是按照政策結果（評分從 1 失敗到 4 成功）與制裁的貢獻（評分從 1 到 4）的乘積去顯示最終結果，故此依變數的分類方式恐有疑慮，且作者也未說明具體分類方式。

本論文認為應採用 Krustev and Morgan (2011)和 Grauvogel and Attia (2020) 對於依變數的處理，將依變數明確分為目標者妥協與發起者縮手，並針對其他制裁結果進行詳細的分類，透過比較目標者妥協與發起者縮手理解自變數對於雙邊

的因果機制，如此方能對於何種因素容易影響制裁成效有更全面的理解，同時不忽略來自佔據主導地位發起者的影響因素。



第三章 影響發起者縮手的因素

「成本」是影響發起者縮手行為的關鍵因素，有關影響制裁因素的討論，成本利益考量是最早的見解之一。此概念源於理性選擇理論，當發起者在經濟制裁所得到的利益小於其付出的成本時，發起者便會傾向於縮手；或者是說，當發起者發動制裁迫使目標者付出成本時，發現自己所付出的成本並沒有比目標者還要少時，便會傾向於縮手(Baldwin, 2000; Schelling, 1984)。¹本論文認為影響發起者縮手的成本不只是發起者與目標者內部經濟損失方面的比較，發起者需要承受來自國內外政治方面的期待與壓力亦是發起者需要考量的重點。據此，成本又可以被區分為經濟成本與政治成本，經濟成本是發起者實施制裁後需要承擔的經濟損失或其他行為者所施加的經濟懲罰，如二次制裁、國際組織懲處等；政治成本則是發起者制裁後所需面臨來自內部支持者與外部行為者政治上的壓力。本論文依據成本概念提出三個研究假設：

第一節 歐盟主導制裁

影響發起者縮手的國際層次因素為發起者是否有盟友或國際組織的支持，其中的爭點為國際組織制裁與單一國家制裁的成效。目前學界已普遍認為多邊制裁中，若是有國際組織來負責組織制裁，將會加大多邊制裁的成效，因為國際組織能幫助發起者有效的整合彼此的意見並達成共識，在執行期間有效的監督成員國間的落實狀況，有統一的機構執行任務與目標者進行談判(Abbott and Snidal, 1998; Drezner, 2000; Keohane and Martin, 1995; Schweller and Priess, 1997)。

有關於國際組織與單一國家制裁成效的爭論，主流見解認為國際組織制裁基於多數國家的參與能大幅增加目標者的成本，讓目標者較難找到替代的市場，而成效比單一國家的制裁高，且能藉由組織制約會員國行為(B. Early, 2021;

¹ 此為 Baldwin (2000)引用 Schelling (1984)所舉出的例子來闡述成本與經濟制裁決策間的關係，將經濟制裁比喻為造成成本的戰略，以是否應該購買一顆子彈為例：「在我可以用購買防彈背心來保護自己的情境下，如果防彈背心很便宜，購買者就浪費了錢；如果我的防彈背心很昂貴，則購買者做成很好的投資；如果問購買者買子彈達成什麼成就，他應該明智地說他對我造成了成本，而不是能夠殺死我。」

Morgan et al., 2023; Peksen, 2019)。反對的見解認為，多邊制裁之於制裁成功率有時並非如此直觀，有時單一國家效率高且精準的制裁往往更能達成其目的(Kaempfer and Lowenberg, 1999)。然而，本論文要探討的並非是對於目標者而言何種制裁成效較高，而是以反向的觀點剖析發起者的行為，究竟是國際組織制裁較容易縮手，還是單一國家制裁較容易縮手？是否國際組織間的縮手行為存在差異？

支持國際組織制裁比較容易縮手的學者發現，發起者間的尋租行為是導致國際組織制裁效率不彰的原因之一，發起者放棄制裁來源於政策無法有效執行。由於成員國眾多，國際組織難以有效監督成員國背叛制裁，成員國面臨囚徒困境，或成員國政府雖有意願遵守，但國家能力不足以控制民間的非正式交易，導致成效不彰，不得不放棄制裁(Drezner, 2000)；例如，1992年聯合國宣布全面制裁塞爾維亞，但在塞爾維亞邊境仍可觀察到許多的跨境貿易，即使是非盟友關係的阿爾巴尼亞都在向塞爾維亞輸入戰略性物資，半年後安理會便宣告制裁成效不彰移除制裁；聯合國在非洲的武器制裁也是如此，聯合國基於對於成員國缺乏監督、處罰輕微、成員國缺乏政治意願、太晚實施，導致結果往往以失敗告終(Charron, 2011)。

另一個導致容易縮手的原因是基於效率與反應的緩慢，讓制裁容易導致失敗。當組織過於龐大且成員複雜時，對於危機的決策需要得到共識，此無疑降低解決危機的能力。舉例而言，2010年對北韓的制裁與2011年對利比亞和象牙海岸的制裁，若非歐盟有效率的執行制裁並與當地的區域性組織非洲聯盟(AU)和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WAS)合作，上述制裁即有可能因聯合國緩慢的反應而宣告失敗(Biersteker and Portela, 2022; Portela, 2012)。組織內成員間的政治角力更讓組織無法有效執行決策，聯合國雖有針對特定大型制裁設立專門委員會以執行、監督，但人員的聘用多為臨時與任意指派，政治因素是人員派遣最大考量，有關於北韓、剛果、蘇丹等案件的調查員重新任命計畫皆因政治阻撓而困難重重(Wallensteen et al., 2003)。同時，Early (2011) 發現只有國際組織與美國深入合作時方能讓制裁效率提升，若只單看國際組織的參與和制裁成功是呈現負向顯著相關。

反對國際組織制裁比較容易縮手的學者認為，發起者間的談判困難會使國際組織制裁難以縮手，因為發起者間可能在制裁的程度、手段與退讓的標準陷入難以取得共識的狀態，雖然國際組織要求發起者間遵守一致的標準可能讓取得共識的門檻大為下降，但同時發起者間會聚焦於彼此間的談判與共識，反而容易忽略與目標者溝通，或一旦達成共識便難以變通與妥協，最終呈現僵局的結果，像是聯合國對於南斯拉夫的制裁讓聯合國難以針對南斯拉夫的要求進行讓步，因為聯合國方的妥協也意味著共識的瓦解(Kreps and Shepsle, 1990)。

歐盟制裁也面臨類似的情況，對於歐盟而言解除制裁往往比實施制裁還要困難，在大部分成員國認為應該要適時移除制裁的情況下，基於國家利益，總是會出現少數國家投下反對票否決移除制裁的決策；例如，歐盟對於土耳其的制裁長達 15 年，無法移除制裁的原因來自於希臘的反對，另外歐盟對於古巴的制裁無法移除也是源於東歐國家的反對(Portela, 2012)。歐盟發動制裁需要部長級會議的一致通過，且制裁須遵守 12 個月自動移除的日落條款，除非會議決定繼續制裁，制裁才會持續實施；然而，從 1993 到 2019 的 48 起制裁中，平均制裁時間卻是 4.5 年，可見制裁移除容易受到阻礙(Giumelli et al., 2021)。然而，Kreps and Shepsle (1990)和 Portela (2012)所謂國際組織難以取得撤銷制裁的共識，只能說明制裁的時間會持續比較久，無法解釋國際組織比較不傾向於縮手，國際組織有可能在制裁成效不彰的情形下，因為特定國家反對而繼續制裁，但最後依舊只能選擇縮手。

本論文認為並不能簡單地將國際組織視為一個整體與單一國家的經濟制裁做比較，由上面的論述可知，歐盟和聯合國在經濟制裁上的效率有明顯區別。國際組織經濟制裁的研究並不多，但近年來國際組織制裁的數量快速上升，在聯合國制裁的數量與成效式微後，歐盟的功能更被凸顯出來，成為國際組織制裁數量最多的行為者 (Vines, 2012)。Weber and Schneider (2022) 以美國、聯合國、歐盟為主體，透過蒐集自 1989 到 2015 年的資料建立 EUSANCT 資料庫，發現國際組織在全球制裁數量上雖然沒有明顯上升，但在成效上有明顯有上升的趨勢，尤其是歐盟，符合 Vines 的論點（見圖 4、圖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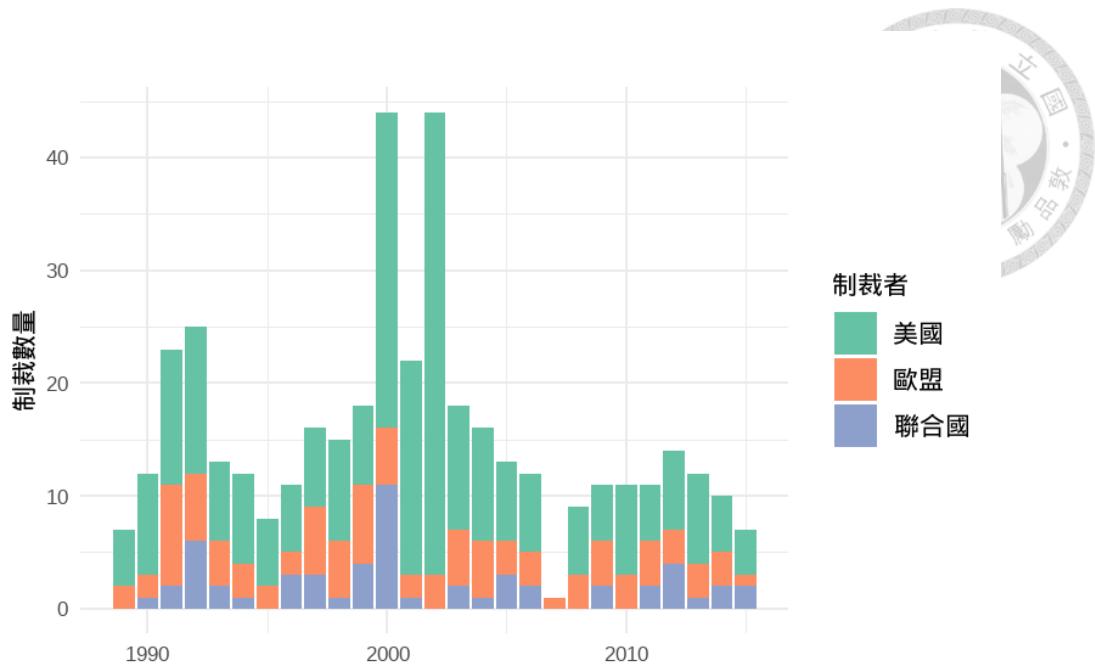


圖 4、國際組織制裁數量

資料來源：作者修改自 Weber and Schneider (2022)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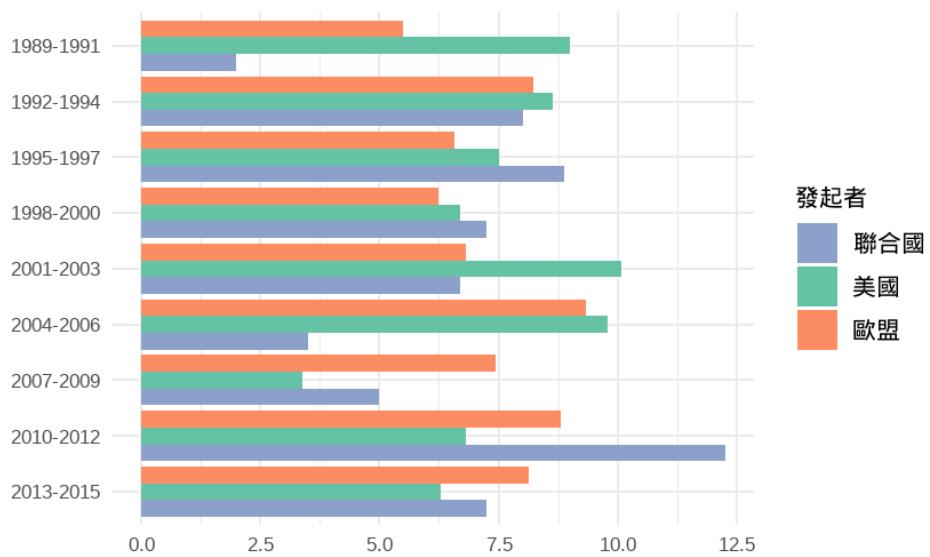


圖 5、國際組織制裁效率

資料來源：修改自 Weber and Schneider (2022)的研究

Vines (2012) 發現歐盟在國際組織經濟制裁上扮演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尤其是在聯合國制裁成效不彰、實施鬆散的時候，例如在聯合國對於伊朗制裁成效有

限的時候，歐盟憑藉著伊朗對其石油貿易的依賴以及在金融世界的主導性地位，成功對伊朗實施有力制裁。另外，在前述 2011 年聯合國制裁象牙海岸的事件中，聯合國由於效率緩慢，無法有效制止總統巴博(Laurent Gbagbo)顛覆選舉的行為，而歐盟則在其中發揮關鍵性的效用，歐盟透過禁止所有歐盟企業與支持巴博的機構進行交易，徹底切斷巴博的資金來源，使巴博沒有資源繼續穩固他的政權。

現有研究雖然指出國際組織主導下的多邊制裁效力會比較高，但上述文獻均未對國際組織間的差異進行詳細的論述。事實上並非所有國際組織制裁都能發揮出多邊制裁的優點，如許多研究指出聯合國制裁成效不彰，本論文認為應就國際組織間的差異進行探討，方能更清楚的解釋特定國際組織相較於單一國家不傾向縮手的原因，同時在理論上做出貢獻。

有研究指出規模大的組織如聯合國容易面臨集體困境問題，成員國的多寡與監督機制將會決定是否能有效阻止裁破壞行為 (Drezner, 2000)，規模越小的組織便越能預防制裁破壞行為，當破壞行為越少發起者越不需要縮手；據此，聯合國基於成員過多而無法有效防止破壞行為，導致其制裁較容易失敗。然而，並非所有規模小的國際組織都能有效防止成員間的背叛，仍仰賴該組織是否有建立有效制度去約束成員國的行為，研究發現歐盟相較於聯合國較能約束成員國的背叛行為，但是其他區域性組織如美洲國家組織(OAS)、非洲聯盟(OAU)則不顯著(Early and Spice, 2015)。可惜的是大部分比較單一國家和國際組織制裁的研究將國際組織視為整體，並未多加區分國際組織間的區別，而 Early and Spice 的研究僅針對國際組織間的背叛行為進行比較，未提及單一國家。

論及歐盟與其他國際組織制裁的差異，歐盟相較於其他國際組織具有嚴謹的制度去監督成員國行為，歐盟不僅明訂法律與規章指導制裁執行，更設立 28 個調查與司法單位監督成員國執行制裁狀況。歐盟針對違背制裁行為訂立一系列法條以供懲處，從個人到公司如果違背制裁不只要面臨高額罰金，還可能被處以六個月至十年的有期徒刑(Giumelli, 2019)，這使得歐盟制裁能真正發揮出多邊制裁的優勢，因為背叛不只要付出高昂經濟成本，更要面對來自歐盟的政治壓力。Weber and Schneider (2020) 則藉由分析 EUSANCT 資料庫發現，實施階段歐盟的制裁比美國更有效力，但此研究採用 HSE 分數(沿用 HSE 資料庫的分類方式)

作為其依變數，而非將制裁結果有效區分為目標者方的妥協或發起者縮手。有學者深究歐盟制裁效力較高的原因發現，不僅出於制度因素，歐盟制裁在歐洲地區已經建立領導地位，許多非歐盟的歐洲國家大部分情況下都遵守歐盟制裁的規定，此現象體現出歐盟協調力在歐洲各國得以實踐，且各國也樂於共享歐盟價值 (Cardwell and Moret, 2023)。

本論文認為並非由國際組織主導的多邊制裁就有比較高的成效，而是由特定國際組織如歐盟所主導的制裁較有成效。由於歐盟具有嚴謹的約束成員國制度，讓制裁比較不受集體困境的影響，當成員國選擇背叛時不僅會面臨來自歐盟的罰款，更要面臨來自歐盟的政治壓力甚至是刑期懲處，不合作所帶來的經濟與政治成本讓歐盟相對而言更能呈現多邊制裁加大目標者經濟成本的優勢，加上成員國間達成共識亦需要成本，故歐盟相較於單一國家會傾向選擇不縮手，本論文依此設立假設：

H1: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歐盟相比單一國家不傾向縮手。

第二節 發起者政治競爭性

首先，就發起者國內政治競爭因素而論，McGillivray and Stam (2004) 研究發現不論是發起者還是目標者領導者的變更，對於經濟制裁的結束均有顯著的影響，發起者的領導者變更會造成領導者傾向放棄制裁；另外，不論是發起者還是目標者，非民主國家領導者的變更相較於民主國家，對於終止制裁的影響還要更加顯著，然而此研究無法說明制裁是由哪一方結束。

Krustev and Morgan (2011) 則立基於 McGillivray and Stam (2004) 的研究再次檢驗領導者改變對於發起者的影響；然而，前者認為雖然後者引用 Bueno de Mesquita 的理論解釋非民主國家領導者的變更比民主國家對制裁終止更為有效，但在自變數的設立上仍應使用獲勝聯盟的變更，而非領導者的變更，更能體現領導集團利益更換對經濟制裁終止的影響。Krustev and Morgan 的研究發現，當獲勝聯盟變化時，發起者傾向於縮手，在推選人團越小的國家（非民主國家），發起者執政聯盟更替相較於民主國家，更會影響制裁終止的決策。

Attia et al.(2020) 利用量化的方式再次驗證領導人改變對制裁終止的影響，認為發起者領導人的改變導致發起者傾向於放棄制裁。與先前研究不同的是，此研究的資料庫來源發起者僅包含美國、歐盟，所以並沒有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的分析。同時，加入歐盟領導者變化因素，有別於以往只討論單一國家領導者變化對經濟制裁的影響，國際組織領導人變化的性質與國家領導人理論上應有所區別，因為利益集團改變造成國際組織領導者改變的機率比單一國家政黨間造成的改變更加困難，此處值得後續的研究更深入討論。

有關於此有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就單一國家而言，發起者領導人更替頻繁意味著政治競爭性強，而政治領導者在面對政治競爭激烈時，為了保障自己的政治生涯會出現以外交政策轉移民眾焦點，進而提升支持率的現象。Attia (2024) 發現當總統在面臨朝小野大或接近選舉年的時候，會傾向使用經濟制裁來提升政治支持度；此外在非選舉年，政治領袖也會透過經濟制裁的實施來展示政策上的活躍(Drury, 2001)。Liou (2024)也發現當總統面臨高度政治競爭性，如強而有力的反對黨以及非暴力社運時，總統實施經濟制裁的可能性會顯著升高。對於政治領袖而言，經濟制裁是低成本的外交工具，同時又能給領袖樹立強硬、有能力的形象，不只能夠鞏固加強領導，還能夠透過議題的設立建構話語權(McLean and Whang, 2014)。

分析美國近期的對外政策即可發現，實施與不放棄經濟制裁是主要的政策趨勢。2016 年川普在上任之後就陸續透過對伊朗、北韓、中國、俄羅斯實行經濟制裁來設定政策議題，藉此鞏固領導，提升國內凝聚力(Drezner, 2019)。而繼任的拜登雖然在對中國的態度上明顯沒有川普強硬，但仍在川普的政策基礎上擴大制裁目標對象，延續以經濟制裁作為主要對外策略的政策風格。

現有文獻雖然對發起者領導人更替與經濟制裁有所探討，認為政治競爭性的強弱會影響領導者是否實施經濟制裁，卻缺乏領導者對於既有經濟制裁是否選擇縮手的研究。據此，便無法有效解釋現今歐美領導者傾向於不放棄經濟制裁的政策趨勢；同時，既有研究也缺乏國際組織領導人更替對縮手行為的探討。故本論文認為應將國家或國際組織內部政治競爭激烈性作為重要變數進行研究，方能有效解釋西方國家不傾向放棄經濟制裁的現象。

本論文認為經濟制裁作為對外行為中，相對於軍事手段成本較低，且可以有效轉移民眾焦點，提升國內支持率的工具，目前已成為西方世界領導者大規模使用的對外政策。西方近年來面臨政治極端化、政治菁英高度分化等現象，使得國內或國際組織內部的政治競爭更加劇烈，領導人更替頻繁，政治領袖與候選人甚至開始將經濟制裁當作主要的政策與競選宣傳，以建立對外強硬、有能力的領導者形象，以維繫政權；相對的，放棄制裁被視為軟弱、能力不佳的表現，流失內部支持所需要付出的政治成本，對於一個面臨高度政治競爭環境的領袖是沉重的，來自支持者的懲罰是發起者選擇不縮手的關鍵因素。故本論文依此假設：

H2: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當發起者政治競爭性越強，發起者不傾向縮手。

第三節 目標者軍事上的國家能力

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概念的出現，早在社會科學研究現代國家時，就已隨之而生。M. Weber (1964)在描述現代國家時，認為現代國家是有能力實踐法律和政策的組織，而學者們多延續 Weber 的理念建立國家能力的概念。延續 Weber 觀點，Mann (1984, 2008) 認為國家權力的關鍵在於其領土的掌控性，並將國家的經濟、軍事能力(despotic power)與滲透民間的力量(infrastructural power)做出結合，Soifer (2008)則進一步解釋 infrastructural power，認為此有兩種意義，第一種是中央政府自行完成目標的能力，第二種是政府對社會的影響力。Mann 和 Soifer 均認為國家能力即國家權力的一種形式。Skocpol (1997) 則在 1960 年代研究國家自主性的浪潮中，定義國家能力為國家有執行其意志、政策的能力。

雖然早在 1960 年代學界就已經對國家能力提出理論性的解釋，但在實際操作上卻難以衡量一個國家確切的能力，於是有一派學者即主張應該藉由衡量國家的經濟能力或民主化程度來得知國家能力，因為普遍而言民主先進國家的經濟能力較佳，政策執行力較高。較為傳統的見解是利用國家 GDP 或嬰兒死亡率來衡量國家能力(Bustikova and Corduneanu-Huci, 2017; Fearon and Laitin, 2003)，而 Beckley (2018)進一步認為不能只單純衡量國家總體 GDP，因為如果國家的財富聚集在少數人手中或政府支出較多則容易讓測量出現偏誤，無法有效體現國家真

正的經濟狀況，應使用 $GDP \times GDP \text{ per capita}$ 來確認國民實質富裕程度。

對此，Fukuyama (2013) 則提出相反的立論，認為不應該用國家的產出(output)來衡量國家能力，因為會受到各種外界因素的影響，應該要以國家汲取資源的能力以及其本身的專業性(input)作為衡量依據。有一派學者認為應該就國家的收稅能力來衡量國家能力，即國家收益占總體 GDP 的比重，以此衡量國家的汲取能力(extraction) (Cárdenas, 2010; Sobek and Thies, 2015)。而此方法的限制不外乎難以取得二十世紀中葉以前的資料，在非西方國家更是難以蒐集資訊。

另一派學者主張用民主、法治等指標來衡量國家能力，當國家的民主程度越高時通常政府能力、法治程度也會越高，連帶財政能力也會越佳。最常見的就是使用國家治理指標(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當中的法治、規範質量、貪污程度來衡量國家能力(Andrews et al., 2017; Fukuyama, 2014; Pritchett, 2022)。另外，O'Reilly and Murphy (2022) 使用 V-dem 民主多樣性資料庫來衡量國家官僚能力、教育程度、法治程度、財政能力等指標。

第四派學者認為應該要以國家的軍事能力為主衡量國家能力，此立論起源於學者 Held (1992) 對於現代國家起源的論述，認為現代國家的出現歸功於戰爭的威脅與準備，當國家處於無政府的國際環境中長期面臨戰爭的恐懼，使得國家不得不調動社會資源以準備戰爭，從向人民抽稅以製造武器、培育軍隊，到調動國內人員參加戰爭、製造補給物，王權必須適度向社會讓權以爭取更多資源的支持，為此國家能力得以大幅提升。是故，可以透過國家的軍事預算與開銷來衡量國家能力。Besley and Persson (2008, 2009) 發現戰爭期間的稅收占比顯然比非戰爭期間還高，潛在的戰爭危機會促使政府汲取資源投入成本建立公共財。Dincecco et al. (2019) 進一步指出戰爭威脅提升國家能力的情形不只限於歐美國家，在廣泛的非西方國家都能適用。

本論文採用軍事上的國家能力作為國家能力的操作型定義，因為以民主和經濟作為衡量依據明顯無法適用於像俄羅斯、中國、北韓、伊朗等共產、獨裁國家，上述國家的經濟表現明顯無法比擬西方國家，俄羅斯的經濟表現自從蘇聯瓦解後便一直難以趕上西方世界，中國的表現在 2008 年以前與西方相去甚遠，更遑論改革開放之前，北韓和伊朗經濟表現更是低迷。然而，這種非民主、經濟表現不

佳的國家其國家動員能力往往是西方嘆為觀止的，尤其是在軍事等政府看重的重點產業，更是以舉國之力達到跟西方相似的水平，像是核武器、太空計畫等等。同時，以經濟制裁相關研究而言，已經有研究指出目標者民主程度、經濟表現與制裁結果之間的關係，若是仍以經濟與民主作為指標會出現概念重疊的問題，故在此使用軍事能力作為軍事上國家能力的操作型定義。

另外，本研究不使用官僚能力(Bureaucratic capacity)作為操作型定義的原因在於，官僚能力的內容複雜，在進行測量時往往會牽涉到官僚品質與治理能力，而非單純汲取資源、收稅的能力(Williams, 2021)。Suryanarayan (2024)指出主流的官僚能力定義為專業官僚本身自主性、選拔機制、政策實行的能力，像是O'Reilly and Murphy (2022)就使用國家基礎建設與預算使用是傾向於特定利益導向或公共財導向來衡量其官僚能力。故本論文認為比起衡量官僚品質、治理能力，軍事上的國家能力更能測量共產或獨裁國家對於國家的掌控能力，因為在此種國家中，官僚通常淪為恩庇恃從下用於鞏固裙帶關係的工具，貪汙情形嚴重且缺乏專業治理素養(Wang and Yan, 2020)。

回歸到國家能力與經濟制裁間的關係，本論文認為軍事上的國家能力能有效說明制裁發動國放棄制裁的原因。長期以來有許多研究探討目標者抵抗經濟制裁能力與經濟表現間的關係，發現當目標者的經濟表現越佳時，國家越有能力抵抗來自經濟制裁的衝擊，對於制裁的脅迫越不容易妥協(Barber, 1979；Hufbauer et al., 2007)；然而，此論點並不能有效解釋經濟制裁往往無法有效撼動經濟表現不佳的共產或獨裁國家，例如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國即使遭受到歐美的聯合制裁仍不為所動，最終西方選擇放棄；2022年歐美制裁無法阻止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人權侵害；2016年對古巴的制裁以及2018年對伊朗制裁的挫敗(Attia and Grauvogel, 2019)。

美國對於北韓的經濟制裁也是經典的例證，2006年開始歐美多次對北韓實施經濟制裁，企圖逼迫停止北韓的核計畫卻都沒有有效成果，許多國家認為是中國和俄羅斯的幫助能有效讓北韓度過難關，但後期兩國均加入聯合國對北韓的制裁中，制裁仍沒有起到施壓的作用。北韓之所以能夠抵抗西方的壓力並非來自於自身的經濟實力，而是源於西方低估北韓的動員國家資源的能力，北韓在經濟制

裁後國家預算不減反增，並透過黑市取得被禁的資源；同時，將經濟制裁的衝擊轉移到一般民眾身上，即使人民生活越來越差也無法撼動領導者決策(Chen, 2017)。

除此之外，西方對俄羅斯 2014 年克里米亞事件後的經濟制裁確實給莫斯科帶來經濟打擊，為私人資本造成 5.3 億的流失，卻無法起到相應的作用。Li and Li (2022) 以夜間光源當作佐證經濟活動的依據，發現在制裁期間莫斯科政治菁英利用政策強行將全國資源集中至莫斯科、聖彼得堡等主要大城市，大城市與郊區間的照明程度差距在制裁後明顯比制裁前差距更大，燈源更集中在工業區。莫斯科透過國家能力調動資源依然能在經濟表現不好的狀況下，對抗來自歐美的制裁，可見國家能力對於制裁結果的影響性。

本論文認為軍事上的國家能力能幫助國家在經濟狀況不佳或制裁造成嚴重經濟衝擊的情況下，對抗來自國外的制裁，當制裁發起者認知到目標者的韌性極強，目標者的經濟成本能依靠資源的調動而有效緩解，同時發起者本身由於執行制裁仍持續消耗資源時，考量到成本與利益的平衡，發起者便會降低繼續制裁的意願，據此設立假設：

H3: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目標者軍事上的國家能力越高，發起者越傾向縮手。

第四節 其他因素

(一) 發起者方

1. 發起者經濟損失

發起者基因於制裁所帶來的國內經濟損失是發起者是否決定縮手的重要因素，也是傳統上經濟制裁研究中主流的論點之一。然而，經濟損失是否對制裁結果有顯著的影響，學界一直未有明確的共識。Morgan and Schwebach (1997)統計 HSE 資料庫發現，當發起者成本越高時，經濟制裁結果對發起者越不利。Farmer (2000)清楚舉出制裁會給發起者帶來經濟效率的立即性損失、未來經濟下降的額外損失，以及市場相對優勢的損失等等。此研究雖然清楚歸納出發起者可能遭受的成本，但並未有實證性的研究證據，僅理論性的推倒；同時，並沒有解釋國力

不同與成本間的連結，就像文中所承認許多推論出的成本可能對美國的影響微乎其微。

有些學者認為國內經濟損失未必對發起者行為造成顯著影響，Attia et al.(2020) 利用 EUSANCT 資料庫進行實證分析，發現發起者與目標者妥協呈現負向顯著相關但對發起者縮手則無顯著影響，表示發起者經濟損失越高會讓目標者選擇不妥協，但對發起者本身的決策不會造成影響。本論文將發起者的經濟損失設為控制變數，參照 Attia et al.(2020)的測量方法，以發起者經濟制裁的實施規模與程度來衡量其中的經濟損失，以此來控制此因素對依變數的影響。

2. 發起者制裁承諾

聽眾成本是影響發起者縮手行為的因素之一，聽眾成本指當國家領導人針對特定的議題表達立場做出承諾時，無法履行承諾所必須付出的代價。Dorussen and Mo (2001) 透過發起者國家的反對制裁抗議數量與 HSE 資料庫中的制裁結果做量化分析，認為聽眾成本會影響發起者終止制裁意願；然而，此文並沒有論述承諾與抗議間的關係，難以清楚知道國內的抗議是否是因為政府違背承諾所導致。

Krustev and Morgan (2011) 則修正 Dorussen and Mo 的方法，將聽眾成本對於制裁終止的影響區分為發起者方和目標者方，認為發起者清楚的威脅會導致發起者越不容易終止制裁，目標者越傾向快速妥協，因為當發起者的制裁威脅越清晰，發起者民眾就越能從聲明中判定發起者是否有遵照威脅予以行動，例如發起者的要求是提升目標者民主程度，但民主程度本身是模糊的概念，民眾會難以判定目標者是否有達成發起者要求，故即使發起者並沒有實施制裁也讓民眾難以究責；若發起者將要求訂的非常明確，如要求引渡賓拉登，則民眾就可以明確的判定目標者是否有滿足要求，當目標者沒有達到發起者要求時，若發起者沒有採取制裁以示懲戒，民眾將能予以究責。

另外，如果發起者的聲明中僅模糊指出若目標者沒有達成需求，本國可能予以制裁，則民眾將難以斷定政府是否應予以制裁；如果發起者在聲明中明確指出若目標者沒有達成需求，本國一定予以制裁，民眾在政府無作為時則有明確依據可以懲罰政府。所以當發起者定出明確制裁要求時，發起者領袖會因為懼怕民意

的壓力，從而約束自身行為，不敢隨意放棄制裁，傾向於不縮手。亦有許多文章對清晰目標有助於縮短制裁時間表示相同觀點，但可惜的是並未明確指出發起者方的抉擇(Attia and Grauvogel, 2023; Nephew, 2018)。

近期有學者將發起者威脅做出更細緻的程度分類，以驗證聽眾成本理論，即越明確、越能表達決心的訊號就會有越高的聽眾成本，以約束政府終止制裁的行為。蘇翊豪（2022）使用厚資料方法剖析大量美國制裁官方文件後，發現美國會依據制裁事件是政治脈絡或執法脈絡，以及威脅公告的措辭來判定其訊號的昂貴程度（見表 1）。像是同樣針對中國企業中興通訊的制裁，歐巴馬政府因未將此事件視為單純的執法事件故釋放訊號的昂貴性較高，故對政府的約束較高；相反的，川普因為將中興的制裁視為政治事件，訊號昂貴性較低，對政府的約束較低，因為顧及與中國的關係，最終選擇對中興的制裁縮手，放棄制裁。

表 1、美國經濟制裁的訊號昂貴程度表

主政者的偏好 聲明的層級	執法脈絡 偏好維護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政治化脈絡 偏好增加美國經貿收益
批評中國政府的昂貴訊號	對美國政府拘束力高	對美國政府拘束力中
批評中國企業的中等訊號	對美國政府拘束力中	對美國政府拘束力弱
採取制式公告的廉價訊號	對美國政府拘束力弱	對美國政府拘束力弱

參考資料：蘇翊豪（2022）

當國家欲規避聽眾成本時，即政府不願被某制裁課予政治責任、企圖留有轉圜餘地，發起者便會選擇不發出公開聲明或採用制式的公告，或是將制裁條件、威脅刻意模糊化，讓其制裁策略有更大實施的空間，因為民眾會難以判定目標者是否達成需求，進而無法對政府施壓或懲處；然而普遍認為模糊制裁並非一個好的制裁策略，因為可能導致目標者的無所適從(Grauvogel and Attia, 2020; 蘇翊豪，2022)。

本論文以此設立控制變數，以發起者是否發出明確的威脅測量發起者的聽眾成本，因為大部分發起者傾向於考量內部民眾對於政府的評價，清晰且明確的威脅可以被視為昂貴的訊號，利於民眾判定政府是否遵守承諾，影響發起者經濟制裁的縮手行為。



3. 落日條款

經濟制裁本身的設計會影響到制裁終止的時間，據 Attia and Grauvogel (2019) 統計，設有落日條款最多的發起者依次分別是：歐盟、聯合國、美國、區域組織，而制裁時常的排序由長到短是美國、聯合國、歐盟、區域組織，似乎設立落日條款的國家制裁時間會比較短，但此結果並不能排除其他因素干擾制裁時長。Attia and Grauvogel (2023) 研究得出不同的結論，在使用全部的制裁設計與結束時長做生存模型分析後發現，設置落日條款反而會增加制裁時長，但由於分析的對象僅限制裁時間並非確切制裁結果，故無法明確指出落日條款與發起者縮手間的關係。

4. 冷戰

冷戰時期經濟制裁多用於支持美蘇的冷戰政策，制裁的兩個主要目的為動搖目標者政權與介入領土衝突，依據 GSDB 資料的統計，冷戰時期的制裁失敗率比後冷戰時期失敗率要高(Morgan et al., 2023)。本論文認為由於制裁目的涉及目標者核心利益，目標者較不願意選擇妥協，使的發起者會傾向於縮手，以此設立控制變數。

（二）目標者方

1. 目標者政治穩定

國內行為者對經濟制裁決策的影響機制源於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此理論假設國內行為者如個人、利益集團與企業等皆是出於理性而有所行動，出於自利的行為動機有時大於公利。目標者內的政治不穩定性代表國內民眾與利益團體對於國家政策的不滿，體現於國內的大規模抗議(Chenoweth and Stephan, 2011; Clark and Regan, 2022)。當國家不穩定性高時會影響國家對於制裁壓力的抵抗性，尤其抗議的標的與經濟制裁、經濟表現相關更會影響目標者政府的決策(Major, 2012)。當目標者內的民眾選擇反對政府政策時目標者會傾向於妥協；同時，發起者會因為目標者的妥協而選擇不縮手(Dorussen and Mo, 2001)。

Onder (2020) 的研究強調反對派在國內政策決策中的重要性，在發起者內不存在反對派，以及目標者存在反對派（反對國家抵抗政策）的情形下，經濟制裁

將能達到最好的成效；相反的，發起者內存在反對派，同時目標者不存在反對派的情形，將會導致經濟制裁成效達到最低的結果。通常以公共選擇理論為基準出發的研究強調國內行為者的能動性，但是國內行為者的作為往往不易觀察，比較能作為觀察指標的僅示威遊行，而且反對派在此類研究中常被視為一個具單一性質的群體，忽略反對派間的差異性，需要有更深入的質性研究補充此研究缺口。

另一個解釋目標者政制穩定影響發起者行為的途徑是民族主義，當發起者的制裁引發目標者內的民眾不滿，或被目標者內的領導者用來聚集民眾的愛國情緒，而引發聚旗效應時，領導人如果輕易退縮將會嚴重損害其名譽，促使目標者更不願意選擇妥協(Dafoe et al., 2021; Gottfried and Trager, 2016; Grossman et al., 2018)。在威權國家中，若抗議的規模達到讓發起者政府覺得難以控制的程度時，發起者會為了避免執政集團更迭成對外態度更加強硬的政府，而選擇讓步與縮手(Weiss, 2013)。

2. 目標者民主程度

經濟制裁研究中有關於目標者政權相關的討論與文獻也越來越多，學界普遍認為經濟制裁對民主政權相較於獨裁政權更加有效，獨裁國家相較於民主國家更容易成為經濟制裁的對象(Attia et al., 2020; Biglaiser and Lektzian, 2011; Lektzian and Souva, 2009; Major, 2012; Peksen, 2017; Von Soest and Wahman, 2015)，Allen (2008)強調國內系統對於制裁效力的影響，當制裁導致國內的經濟表現低落進而影響到人民生活時，人民便會透過遊行、抗議、暴亂等方式向政府表達不滿，迫使政府改變回應；然而，通常在越獨裁的國家越難以觀察到反政府的遊行、抗議，因為人民在政府的高壓掌控下難以聚集，同時畏懼反政府所帶來的高昂成本。本論文認為當經濟制裁對國內經濟造成影響時，越民主的國家所承受的國內壓力就越大，獨裁國家則傾向以民族主義轉移民眾經濟困頓的焦點，故當目標者民主程度越高則發起者越不傾向於縮手，以此設立控制變數。

3. 目標者經濟表現

許多研究指出當目標者的經濟表現越差時，對於經濟制裁的抵抗力會較低，目標者就越容易妥協(Barber, 1979; Hufbauer et al., 1990)。當目標者出現經濟危機

時更是會動搖目標者政府執政的正當性，讓目標者政府為了維持執政地位而選擇妥協(Teorell, 2010)。雖然上述研究證實目標者經濟表現與目標者妥協間的相關性，但無法說明目標者經濟表現與發起者縮手間的關係。Attia et al.(2020)的研究發現目標者的經濟表現與發起者縮手間呈負向關係，但並沒有顯著相關性。有關目標者經濟表現是否影響發起者縮手仍須未來繼續研究。

第四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論文自變數有歐盟主導、發起者政治競爭性、發起者成本、目標者軍事上國家能力三項，其因果機制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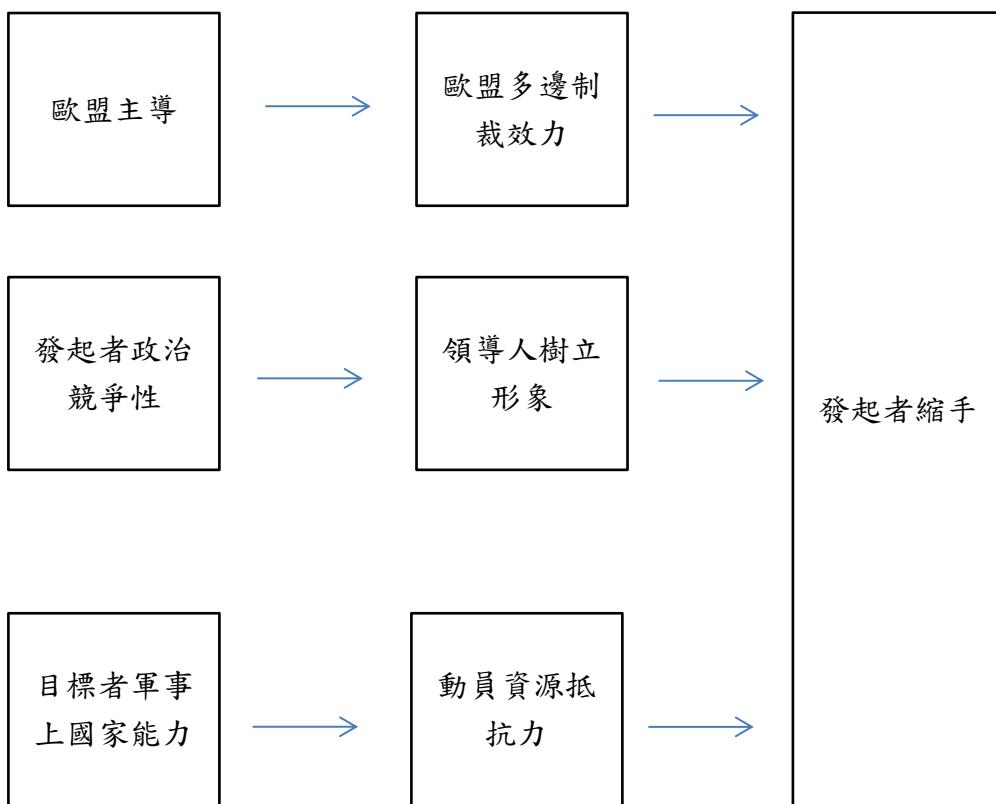


圖 6、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第二節 資料結構與來源

本論文使用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Termination (IST) 資料庫作為經濟制裁資料來源，以經濟制裁案例作為分析單位，進行研究。該資料庫的經濟制裁年代包括 1950-2018 年的資料，²制裁發起者包括美國、歐盟、聯合國、其他國際區域

² 此文的標題是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Termination, 1990–2018: Introducing the IST dataset, 但實際上 1990 指的是 1990 以前就已經存在或持續進行的經濟制裁案件，為了釐清確切的涵蓋年代，本

組織等制裁行為者，制裁目標者則包括全世界 116 個不同的國家，資料結構為 case-level，一筆資料即為一個制裁案件。IST 資料庫總共包含 399 個經濟制裁案例，其中美國所發動的制裁數量最多有 245 個案例，歐洲有 83 個案例，聯合國有 32 個案例，其他類型的區域組織則佔 39 個(Attia and Grauvogel, 2023)。

此資料庫特色有三：一、具有詳盡的制裁結束時間與結果，IST 資料庫聚焦於制裁結束，所以相較於其他的資料庫具有較少的結束時間遺漏值，在制裁結果方面，主要學習 TIES 資料庫的方法進行區分，以利研究者清楚區分發起者方與目標者方。二、加入制裁設計相關變數，此資料庫首創在資料庫中加入審查機制 (review provision)、審查機構 (institutional investment)、改變目標 (adaption of goals)、落日條款 (expiry date) 等變數，幫助研究者探討不同制裁設計對於制裁結果的影響。三、加入地區性國際組織，方便學者研究歐盟與聯合國外的國際組織經濟制裁。

有關經濟制裁資料庫的量化研究從二十世紀初便開始，包括 IST 資料庫主要有 6 個與制裁相關的資料庫（見表 2），而以下將簡介其他經濟制裁資料庫與闡述為何本論文要使用 IST 資料庫的原因 (Portela and Charron, 2022)。最早的資料庫為 Hufbauer et al. (1990) 所編纂的 HSE 資料庫，此資料庫在連續三波的更新後，年代橫跨 1914-2000 年，特色在於首創制裁結果成功程度指標 (HSE score)，乃將政策結果的評分與制裁貢獻度相乘。接下來，Morgan et al. (2014) 創建目前學界使用最廣的 TIES 資料庫，時間從 1945-2005 共 1415 筆資料，此資料庫最大貢獻在於將制裁細分成威脅階段和實施階段，同時將制裁結果細分為目標者妥協、部分妥協、發起者縮手等結果，此資料庫編纂形式為後續資料庫主要效仿對象。

學界後續開始出現針對歐盟與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經濟制裁的研究，像是 Biersteker et al. (2018) 建立的 Targeted Sanctions Consortium (TSC) 資料庫僅蒐集聯合國制裁案件，是一個專門針對聯合國的制裁資料庫，時間為 1991-2013 年；另外，Weber and Schneider (2022) 以美國、聯合國、歐盟為主體創立 EUSANCT

論文沿用其他制裁資料庫從最早起始年開始計算的做法，以最早制裁開始年代計算，故改成 1950。

資料庫，為首個將國家與國際組織經濟制裁合併的資料庫。目前年代最新的資料庫為 Felbermayr et al.(2020)創建的 Global Sanctions Data Base (GSDB) 資料庫，年代橫跨 1950 年到 2023 年，主要行為者包含國家與不同的國際組織(Yalcin et al., 2025)。



比較各個資料庫衡量經濟制裁結果的標準發現，大致可以區分為比較寬鬆的界定方式與嚴謹的界定方式。寬鬆界定為制裁結果只能被區分為成功與失敗兩種，無法被更精確的判斷結果類型，如 HSE 資料庫。HSE 將制裁結果分為政策結果(policy result)和制裁貢獻(contributions of sanctions)，各結果以 1-4 不同的分數劃分，最後兩者會乘積出 1-16 分的制裁結果，分數越高表示制裁越成功，此區分方式定義模糊，難以將分數靠中間的制裁進行分類，對於失敗的制裁也難以界定究竟是發起者縮手、僵局還是持續進行。或者成功的界定範圍比其他資料庫更廣泛，如 TSC 資料庫。TSC 將制裁目的擴充，限制目標者與發送訊號都被視為一種制裁成功，有別於傳統上目標者需要作出行為上的改變才能被視為成功的標準。

嚴謹界定為能清晰的區分制裁的各種可能結果，最經典的案例為 TIES 所發展出來，將制裁結果區分為目標者妥協、發起者縮手與其他制裁結果的分類方式。TIES 一共有 10 種不同的制裁結果，後續的資料庫如 EUSANCT、IST、GSDB 都承襲此種分類方式，只是 IST、GSDB 資料庫沒有威脅階段制裁，故只有 5-6 種結果。本論文認為 TIES 的分類方式較能清楚呈現經濟制裁的最終結果，進而有助於研究者分析，寬鬆的界定方式雖然能以多元的視角看待制裁的目標與功能，但標準未能統一且最後的結果不明，僅能籠統的區分為成功與失敗。

本論文使用 IST 資料庫的原因在於，其不僅沿用 TIES 資料庫對制裁結果的分類方式，相較於 HSE 與 TIES 資料庫，此資料庫年代更新到 2018 年較符合現在國際制裁情形，分析結果較能符合現今國際局勢，上述兩個資料庫均已年代久遠。TSC 資料庫對象僅限於聯合國，分析單位與範圍過於狹隘，分析結果恐適用範圍有限。EUSANCT 資料庫資料只到 2015 年，彼時世界大國間的關係與現今有所差距，尤其中美俄之間的關係尚為友好；同時，EUSANCT 資料庫沒有包含其他區域性國際組織。GSDB 資料庫雖然年代及至 2023 年，但是制裁結束時

間沒有 IST 詳細且變數僅有 5 個缺乏制裁設計、發起者承諾等相關重要變數。

表 2、經濟制裁資料庫比較

	時間與觀察值	優點與特點	缺點與不足
HSE	1914-2000 174 個	1.發起者和目標者的成本 2.包含第三國的態度 3.以單一國家為核心	1.年代久遠 2.HSE score 以政策結果和制裁的貢獻的分數乘積決定制裁結果，定義不明確
TIES	1945-2005 1412 個	1.以單一國家為核心，國際組織為輔 2.加入威脅階段的制裁，將制裁結果細分成發起者和目標者方等 13 種不同結果(v39) 3.最具代表性	1.變數雖多，但部分存在大量遺漏值，如發起者成本、利益誘因(carrot) 2.年代久遠
TSC	1991-2013 23 個 (63 個節點 episode)	1.僅針對聯合國制裁 2.將事件(case)依據時間和目標不同拆分成不同段(episodes) 3.將對象擴大到非國家行為者，例如軍團、私人企業、網路犯罪者等等 4.將制裁成功標準多元化細分為：脅迫、限制、訊號	1.分析單位與範圍狹隘 2.觀察值數量少
EUSANCT	1989-2015 326 個	1.蒐集美國、歐盟、聯合國三大制裁主體，重視歐盟制裁 2.延續 TIES 對制裁結果的詳細區分 3.包含威脅階段制裁	忽略其他單一國家制裁
IST	1950-2018 399 個	1.具有詳盡的制裁結束時間與結果 2.加入制裁設計相關變數	1.缺乏單一國家 2.缺少威脅階段制裁 3.制裁成本變數

		3.加入地區性國際組織	NA 過多
GSDB	1950-2023 1547 個	1.年代較新 2.包含國家、各個國際組織制裁	1.變數較少，缺乏如制裁承諾明確性、成本等重要變數 2.缺少威脅階段制裁

參考資料：Portela and Charron (2022); Attia and Grauvogel (2023); Felbermayr et al.(2020); Yalcin et al. (2025)

第三節 變數測量

一、依變數

本論文依變數為發起者縮手，IST 資料庫將制裁結果區分為目標者完全妥協(complete acquiescence by target)、目標者部分妥協(partial acquiescence by target)、發起者縮手(capitulation by sender)、僵局(stalemate)、談判協商(negotiated settlement)、持續進行(ongoing)六種。本論文則將經濟制裁結果重新區分為三種，分別是目標者妥協（代號編為 1）、發起者縮手（代號編為 2）、持續進行（代號編為 0），以利各分類間數目的平衡有助於後續測量分析（見圖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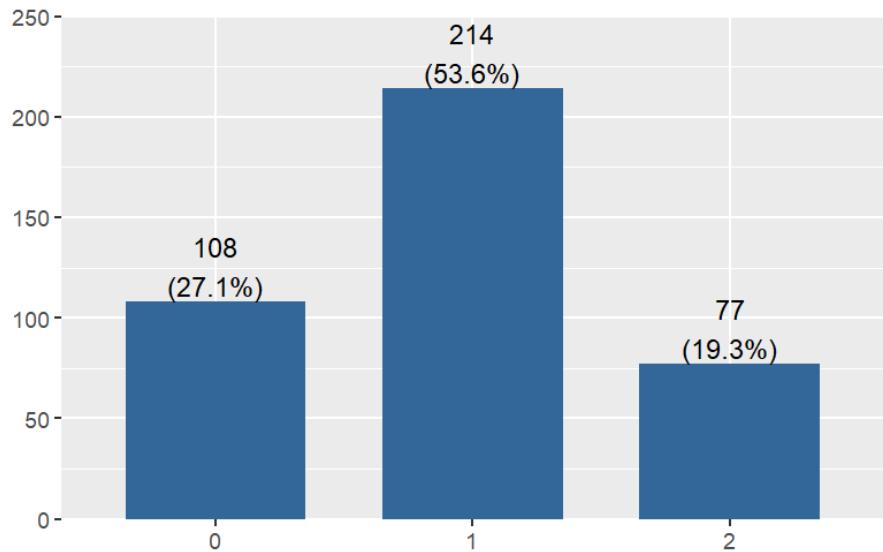


圖 7、經濟制裁結果數量分布

資料來源：作者重新編碼 IST 資料庫後自行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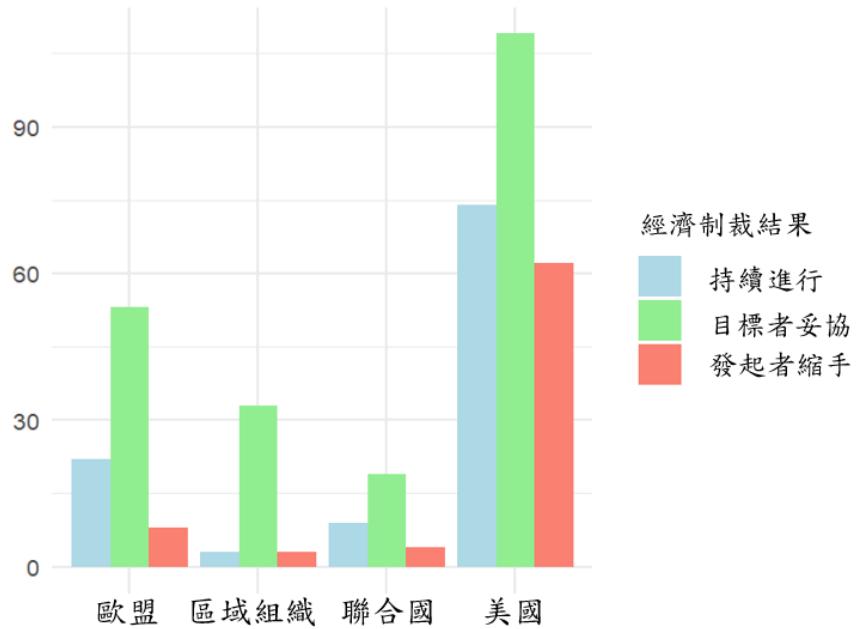


圖 8、各發起者經濟制裁結果數量分布

資料來源：作者重新編碼 IST 資料庫後自行繪製

依據上述，本論文將發起者縮手與僵局設為發起者縮手，僵局的分類原因在於，依據定義僵局為目標者在沒有改變其政策和行為的前提下，發起者自行移除制裁；而發起者縮手的定義是目標者在無法達成發起者要求的前提下，選擇主動放棄制裁，兩者的路徑雖然不同，但是結果都是發起者主動放棄制裁，所以都列

為發起者縮手，本論文將其設為參照組(base category)用以與其他兩個類別作統計上的對照。將目標者完全妥協與雙邊協商列為目標者妥協，雙邊協商列為目標者妥協的原因是，雙邊協商依據資料庫編碼簿的定義為目標者藉由部分妥協來換取發起者重啟談判協商，故視作目標者妥協；另外，目標者部分妥協雖然相較於完全妥協沒有那麼明確對發起者有利，但發起者仍部分達成其目標，故列為目標者妥協，符合大部分研究的分類方法(Attia et al., 2020)。第三類結果持續進行則是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仍在持續制裁的案件。

表 3、制裁結果編碼統整

IST 制裁結果	本論文重新分類結果	備註
發起者縮手	2:發起者縮手	參照組
雙邊僵持		
目標者妥協	1:目標者妥協	
目標者部分妥協		
雙邊協商		
持續制裁	0:制裁持續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二、自變數

本論文自變數有三個，以下詳述測量方法：

第一，歐盟主導。依照第二章的論述，制裁發起者的性質會影響制裁結果，當發起者為國際組織時，會因為其本身集體決策的性質而導致比國家更容易縮手。本論文依據發起者是否為單一國家以及何種國際組織進行分類，歐盟編為 1，聯合國編為 2，區域性組織編為 3，美國作為單一國家的參照組編為 0，為類別變數。

第二，發起者政治競爭性。依據第二章的論述，經濟制裁常被國家領導人用於提升國內支持率，因為國家領導人可以透過經濟制裁的實施建立強硬、具有能力的形象；相對的，若是隨意終止制裁則會產生軟弱、無能力的形象，故本論文

假定當國家或國際組織內部政治競爭激烈時，領導人會為了維繫政權、避免政治成本，對於經濟制裁傾向選擇不縮手。本研究以經濟制裁期間的領導人變更次數加總，來測量該經濟制裁期間發起者內部的政治競爭程度，使用此測量方法能夠以簡單且明確的方式呈現發起者內部競爭性。舉美國與歐盟為例，美國領導人每四年一任可連任兩次，在政治競爭性不強的狀況下領導人一般能成功連任，但在政治競爭性高的狀態下則會出現每四年換一次領導人的狀態，如 2016-2025 年總共換了三次領導人，而在政治競爭性不高的情形下理當只會更換一次；歐盟執委會主席由歐洲議會選舉產生，每五年一任無任期限制，歐洲議會中存在數個由不同歐洲國家政黨所支持的黨派，當政治競爭性高時歐盟領導人會無法連任，甚至任期會提前結束，例如 Jacques Santer 由於貪汙指控而提前結束任期(The Brussels Times, 2015)。

此變數具體測量方法為加總制裁期間的領導人更替次數，舉例而言美國某一經濟制裁為 2006-2019 年，期間經歷小布希、歐巴馬兩屆領導人，故加總為兩次領導人更替。資料來源的部份，本論文針對單一國家以 Archigo 資料庫作為資料來源，針對國際組織則從各個國際組織官網蒐集領導人任期資料進行分析。

第三，目標者軍事上的國家能力。國家能力的操作型定義為國家汲取、動員資源的能力 (Fukuyama, 2013)，學界主要使用國家經濟、民主、軍事表現作為衡量標準。本論文使用目標者軍事能力來衡量國家能力的原因在於，許多研究指出戰爭的威脅是國家發展出國家能力的起源，國家對於戰爭的準備（動員和收稅）能有效解釋國家能力的發展。有鑑於已有目標者經濟表現、民主程度與制裁結果相關的研究，而上述研究均難以解釋共產國家、特定威權國家與制裁結果的關係，為了規避與上述兩者概念重複所帶來的共線性，而採用軍事上的國家能力作為測量依據。

本論文使用 World bank 平台上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資料庫中的軍事預算作為衡量軍事上國家能力的指標。軍事預算是國家在該年度投入在軍事產業的金費總額，乃是依據《年鑑：武器、裁軍與國際安全》統計所得出的結果，並以當前美元(current US\$)進行計算(World Bank, 2024)。本論文將依照制裁的年度計算平均值後取自然對數，當作該制裁案件的對應國家能力；例如制裁歷經

2012-2015 年，將會取四年的軍事預算進行平均後取自然對數，當作該制裁案件的數值。



三、控制變數

本論文控制變數有九，分別是發起者經濟損失、發起者制裁承諾、目標者經濟表現、目標者民主程度、目標者政治穩定程度、落日條款、地理距離、冷戰、時間。除了不會因時間改變的變數如發起者經濟損失、發起者制裁承諾、落日條款設計、地理距離，以上控制變數均依照制裁的年度計算平均值，當作該制裁案件的對應變數值；舉例而言，歐盟制裁古巴的案件從 2003-2008，此期間古巴經濟的年度表現為 8.07、8.13、8.24、8.45、8.55、8.59，加總取平均，則該案件的目標者經濟表現為 8.34。

一，發起者經濟損失。Farmer (2000) 曾以國家經濟成長指標如失業、出口量做為發起者付出成本的依據，但此衡量方式不適切的原因在於，國家總體經濟的漲幅與太多因素相關，研究者很難證明經濟的漲跌是由經濟制裁的實施作導致。以經濟制裁實施最多的國家美國而言，其經濟的落差往往是由國內經濟政策所導致，鮮少是由於終止與特定國家的貿易，對於制裁中小型國家所帶來對總體經濟的影響往往微乎其微。

據此，本論文沿用 Attia et al.(2020) 以經濟制裁類型當作經濟損失測量指標的做法，由禁止旅遊到經濟禁運分成 1-6 個不同的層級，制裁的等級越高則付出的成本越高。制裁類型是旅遊限制、外交制裁、支援制裁、航班停運時編為 1，個人資產凍結編為 2，武器禁運、軍事合作終止編為 3，金融制裁編為 4，石油禁運、商品禁運編為 5，全面貿易終止編為 6。

二，發起者制裁承諾。本論文使用 IST 資料庫的 Termination requirement specificity (requirementter) 變數衡量發起者是否對於制裁具有明確的要求與承諾，來衡量發起者內的聽眾成本，因為當制裁要求越明確國內受眾就越能判斷發起者是否信守承諾執行制裁，故承諾越清晰，聽眾成本就越高。此變數將制裁要求分成清楚與模糊，清楚的定義是發起者對於目標者解除制裁的條件有明確要求，且具容易辨識的侵略性行為(well-defined offending behavior)；模糊則沒有上

述特徵。本論文將清楚編為 1，模糊則編為 0。

三，目標者經濟表現。本論文參考 Grauvogel and Attia (2020) 的作法使用以美元計算的國家總體人均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er capita in US dollars) 當作經濟表現的指標，將其取自然對數(log) 以利於統計計算(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2022)。

四，目標者民主程度。本論文使用自由之家的民主指數當作衡量民主程度的指標，民主指數分成公民自由與政治權利兩項，從最高到最低分別是 1-7 分，1 分表示最不自由，7 分表示最自由。本論文將該年度公民自由與政治權利相加取平均得到目標者該年度的民主程度(Freedom House, 2024; 薛健吾，2021)。

五，目標者政治穩定。本論文使用國家年度發生政變次數當作衡量指標，採用全球政變資料庫(Global Instances of Coups Dataset)作為資料來源(Powell and Thyne, 2011)，以制裁期間政變次數加總計算。

六，落日條款設計。本論文使用 IST 資料庫中的 Expiry date (expiry) 變數來表示發起者針對該制裁是否設定落日條款，即在特定期限內制裁必須結束，如果有設定落日條款編為 1，沒有則編為 0。

七，地理距離。本論文參考 Grauvogel and Attia (2020) 的控制變數設計，利用首都間的地理距離來測量國家間的緊密程度，鄰近國家間的互動與交流相較於遙遠的國家勢必較為頻繁。本論文使用 the GeoDist database 首都間距離當作資料來源，並取自然對數以利後續統計計算(Mayer and Zignago, 2012)。國際組織的位置則採取該組織總部所在國家的首都當作測量依據，因為通常國際組織的總部都設於國家首都或首都附近的大城市，例如布魯塞爾是歐盟距離的計算起點，華盛頓是聯合國距離的計算起點。

八、冷戰。本論文依據制裁時間判斷該制裁是否受到冷戰期間所影響，制裁時間只要有涵蓋到 1946-1991 年均設為 1，其餘為 0。

九，時間。本論文參考 Grauvogel and Attia (2020) 的控制變數設計，為了控制多個時間點對於制裁案件的影響，將制裁持續時間取一次方、二次方與三次

方，即 cubic polynomials (t, t^2, t^3)，處理當依變數是類別變數時，時間對分析單位的相關性問題。



表 4、變數操作定義、內容與資料來源統整

變數名稱	操作定義	內容與性質	資料來源
依變數			
發起者縮手	在目標者不改變其行為的前提下，發起者主動放下，發起者縮手棄制裁	類別變數 2 表示發起者縮手 1 表示目標者妥協 0 表示持續進行	IST 資料庫， 本論文使用 資料庫變數 重新編碼
目標者妥協	目標者改變其政治行為		
持續進行	制裁仍在繼續進行		
自變數			
歐盟主導	發起者是否為國際組織，並細分是哪種國際組織	類別變數 3 表示區域組織 2 表示聯合國 1 表示歐盟 0 表示單一國家	IST 資料庫， 本論文使用 資料庫變數 重新編碼
發起者政治競爭性	發起者領導人在制裁期間更替次數	連續變數	Archigo 資料庫、 本論文自行蒐集 國際組織領導人 更替次數資料
目標者軍事上的國家能力	目標者的軍事預算	連續變數	Worldbank 資料庫
控制變數			
發起者經濟損失	發起者制裁類型	連續變數 6 表示全面貿易終止 5 表示石油禁運、商品禁運 4 表示金融制裁 3 表示武器禁運、軍事合作終止 2 表示個人資產凍結	IST 資料庫， 本論文使用 資料庫變數 重新編碼



		1 表示旅遊限制、 外交制裁、支援制 裁、航班停運	
發起者制裁承諾	發起者制裁要求 是否清楚、具威脅 性	虛擬變數 1 表示發起者制裁 有清楚的要求 0 表示沒有	IST 資料庫
目標者經濟表現	目標者人均 GDP	連續變數	聯合國統計處
目標者民主程度	目標者公民自由 與政治權利	連續變數	自由之家
目標者政治穩定	目標者年度政變 數目	連續變數	Global Instances of Coups Dataset
落日條款	發起者是否設定 制裁期限	虛擬變數 1 表示發起者制有 設定制裁期限 0 表示沒有	IST 資料庫
地理距離	發起者首都到目 標者首都距離	連續變數	GeoDist database
冷戰	制裁過程是否有 涵蓋到冷戰期間	虛擬變數 1 表示制裁有涵蓋 到冷戰期間 0 表示沒有	IST 資料庫， 本論文使用 資料庫變數 重新編碼
時間	制裁持續時間	連續變數	IST 資料庫， 本論文使用 資料庫變數 重新編碼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第四節 統計模型

本論文使用無序多分類羅吉斯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 MNL)作為主要的統計模型。無序多分類羅吉斯模型是類項選擇模型(discrete choice models, DCM)的一種，用於解釋決策者在有限的、互斥的選擇中做出選擇的過程，決策者會在一系列「選項」(choice set)中做出選擇，且選擇必須大於三項以上，選擇與決策者的屬性將會決定模型的使用。若是僅分析具有多種屬性的決策者，如決

策者的年齡、性別、收入，且各種不同屬性會隨決策者的不同而異，則使用 chooser-specific variables (CSV) 來當作統計模型。

使用此模型的原因在於，本論文的研究問題是何種因素導致制裁發起者縮手，目標者和發起者的特徵會因為不同行為者而異，為了比較不同行為者屬性對制裁結果的影響，故設立三種不同的制裁結果（制裁持續、目標者妥協、發起者縮手），因為 CSV 模型可以依據各個國家特徵分析不同的選項的機率故符合本研究的分析需求。本論文會先進行 Hausman Test，確定每個選項之間獨立且不具相關性，符合 IIA 假設 (the 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 assumption)，在確定符合假設後方使用此統計。此模型能有效地闡述不同屬性的國家對於制裁終止的選擇，具有何種屬性的發起者較容易選擇放棄制裁，具有何種屬性的目標者容易讓發起者選擇縮手。

此模型公式如下：

$$p_{ij} = \frac{\exp(x_i' \beta_j)}{\sum_{l=1}^J \exp(x_i' \beta_l)} \quad j=1, \dots, J$$

本研究有三個 j 選項，公式如下：

$$p(i | j=1) = \frac{\exp(x_i' \beta_1)}{\exp(x_i' \beta_1) + \exp(x_i' \beta_2) + \exp(x_i' \beta_3)}$$
$$p(i | j=2) = \frac{\exp(x_i' \beta_2)}{\exp(x_i' \beta_1) + \exp(x_i' \beta_2) + \exp(x_i' \beta_3)}$$
$$p(i | j=3) = \frac{\exp(x_i' \beta_3)}{\exp(x_i' \beta_1) + \exp(x_i' \beta_2) + \exp(x_i' \beta_3)}$$

p_{ij} 是行為者 i 選擇類別 j 的機率，代表發起者 i 選擇經濟制裁終止方式 j 的機率。

x_i 是行為者 i 的特徵，在此模型中保持不變，代表發起者本身的特徵不會隨著他所選擇 j 選項而改變，如軍事上的國家能力只會隨著國家 i 的不同而異，但不會因為其對制裁的最終決策而異。

β_j 是 j 選項的迴歸係數。

l 是所有類別的索引，確保分母加總需等於 1。

分子部分是所有 i 國家選擇 j 選項效用函數(utility function)的指數，分母部分是所有 i 國家選擇 j 選項效用函數的指數加總。



第五章 實證分析

本論文採用無序多分類羅吉斯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 MNL) 作為研究的模型，驗證假設一到三是否符合預期結果。本章第一節將針對研究樣本的參數進行概括性的描述，了解樣本中各個變數的參數分布情形；第二節為本章的重點，利用模型進行假設檢定，驗證分析結果是否符合假設預期；第三節為穩定性檢測，使用不同的模型與資料庫，來檢測第二節所得到的分析結果是否穩健；第四節討論第二節與第三節所得到的統計結果，融合文獻回顧中的理論進行解釋。

第一節 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選自 IST 資料庫中的資料，包括美國、歐盟、聯合國、區域組織從 1950-2018 年的經濟制裁資料，以平均數、標準差、最大值、最小值為參數的描述性對象，具體如表 5。由表 5 可知本研究樣本在扣除遺漏值後有 311 個觀察值。圖 9 為類別變數的次數分配表，美國有 191 個、歐盟有 66 個、聯合國 26 個、區域性組織 28 個，美國經濟制裁數量佔最大宗(61.4%)。

表 5、連續變數與二元變數描述性統計

變數名稱	觀察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自變數					
發起者政治競爭性	311	1.03	1.56	0.00	12.00
目標者軍事上的國家能力	311	19.75	2.35	13.35	26.17
控制變數					
發起者經濟損失	311	3.14	1.37	1.00	6.00
發起者制裁承諾	311	0.70	0.46	0.00	1.00
目標者經濟表現	311	7.26	1.26	4.75	10.87
目標者民主程度	311	3.01	1.60	1.00	7.00
目標者政治穩定	311	0.37	0.63	0.00	3.00
落日條款	311	0.17	0.38	0.00	1.00
兩國距離	311	8.76	0.70	6.00	9.70
冷戰	311	0.11	0.32	0.00	1.00
時間	311	6.41	9.82	0.00	70.00

時間平方	311	137.23	494.90	0.00	4,900
時間三方	311	5,227.26	30,320.95	0.00	343,0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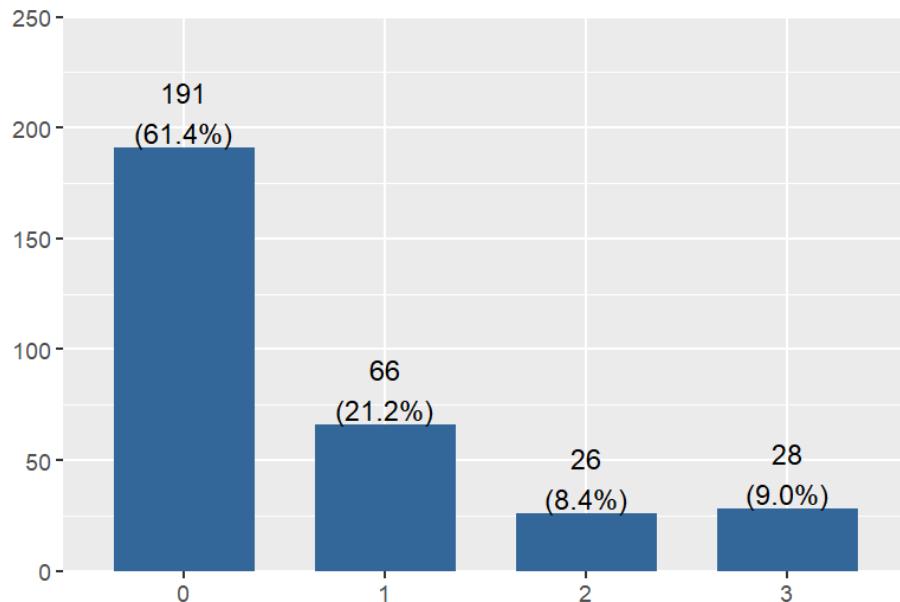


圖 9、類別變數描述性統計

說明：0 是美國，1 是歐盟，2 是聯合國，3 是區域組織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第二節 模型分析

本章節將呈現統計分析的結果。首先，由於本論文的研究問題為什麼樣的因素會讓制裁發起者傾向縮手，故將制裁結果分為三類，分別是制裁持續進行、目標者妥協、發起者縮手；再來，針對三類制裁結果進行 Hausman test，檢測三類制裁結果間是否彼此相互獨立、不互相影響，符合 IIA (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本研究結果發現，持續進行和目標者妥協的 p 值均大於 0.05，且卡方值小於臨界值，表示在排除持續進行或目標者妥協後限制模型與完整模型並無顯著差異，符合 IIA 假設。發起者縮手的卡方值是負數，符合 IIA 假定，故模型整體皆符合 IIA 假定（黃紀、王德育，2012）。

表 6 、Hausman test 檢定結果

	chi2	df	P>chi2
持續進行	4.222	15	0.997
目標者妥協	3.425	15	0.999
發起者縮手	-4.564	15	.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表 7、三種經濟制裁結果的 MNL 模型
(以發起者縮手為基準組)



依變數	持續進行	目標者妥協
發起者方因素		
歐盟主導		
(基準組：美國)		
歐盟	1.907*** (0.734)	1.941*** (0.640)
聯合國	0.595 (0.853)	0.613 (0.728)
區域性組織	-1.109 (1.519)	0.926 (0.861)
發起者政治競爭性	1.324*** (0.491)	0.985** (0.423)
目標者方因素		
目標者軍事上的國家能力	-0.0179 (0.125)	-0.197* (0.110)
控制變數		
發起者經濟損失	0.393** (0.191)	0.192 (0.163)
發起者制裁承諾	0.241 (0.466)	0.515 (0.407)
目標者經濟表現	0.371 (0.251)	-0.394* (0.219)
目標者民主程度	-0.909*** (0.171)	-0.352** (0.142)
目標者政治穩定	-0.635 (0.418)	-0.169 (0.312)
落日條款	-0.209 (0.610)	-0.388 (0.575)
兩國距離	0.835* (0.434)	0.562* (0.339)
冷戰	-3.044*** (1.126)	-0.0688 (0.774)
時間	-0.203* (0.117)	-0.192* (0.104)



時間平方	0.002 (0.005)	0.000 (0.005)
時間三方	0.000 (0.000)	0.000 (0.000)
常數	-8.210* (4.775)	2.983 (3.630)
觀察值 N	311	311

說明： $*p<0.1$; $**p<0.05$; $***p<0.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本研究中發起者縮手是基準組(baseline)，原因在於將發起者縮手設為基準組可以同時分析目標者妥協與持續進行相較於發起者縮手的統計結果，據此只要改變正負號便可以在顯著性不變的情況下，合理的推導出自變數對發起者縮手的影響。表 7 呈現的是相對於發起者縮手，歐盟主導、發起者政治競爭性、發起者成本、目標者軍事上的國家能力對於其他經濟制裁結果——持續進行、目標者妥協的影響。唯本研究主要探討的依變數是發起者縮手，雖然表 7 呈現的是自變數相較於發起者縮手對其他制裁結果的影響，但只要在分析時改變正負號便可以得知自變數對發起者縮手的影響，本論文據此進行以下分析。

自變數分析方面，本論文將美國視為單一國家代表檢測假設一，發現不論在對照目標者妥協或持續進行的情況下，當發起者為歐盟時，相較於單一國家傾向於不縮手；而當發起者為聯合國與區域性組織時，相較於單一國家則沒有顯著影響，符合假設一的預期。同理，在對照目標者妥協或持續進行的情況下，發起者政治競爭性越高，則發起者傾向於不縮手，符合假設二的預期。假設三的部份，相對於目標者妥協，當目標者軍事上的國家能力越強時，即軍事預算越高，發起者越會選擇縮手，但相對於持續進行，目標者軍事上的國家能力沒有顯著影響，假設三僅部分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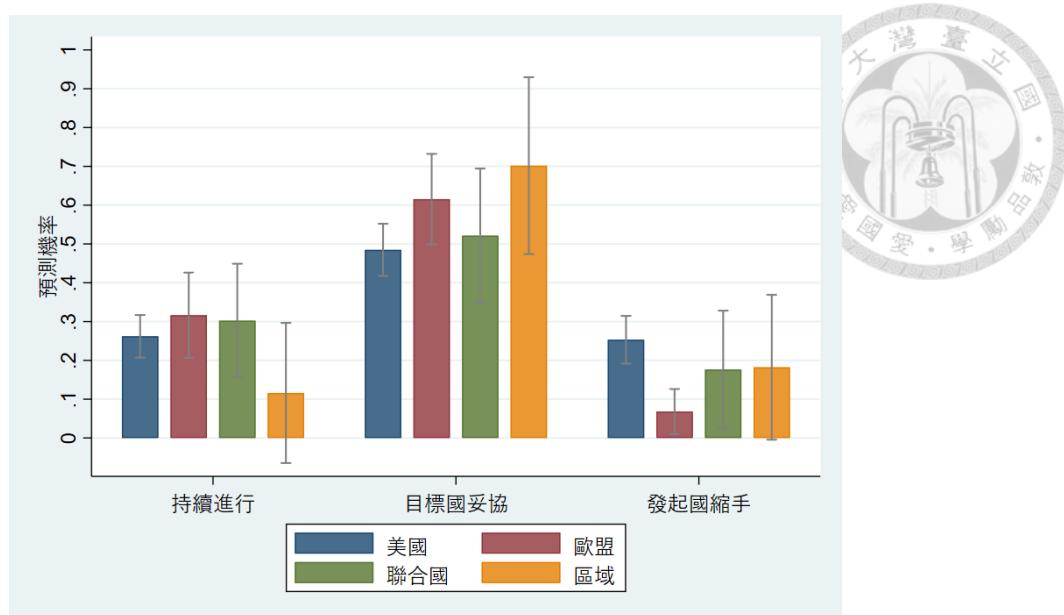


圖 10、歐盟主導預測機率圖

說明：誤差範圍在 95% 信心水準區間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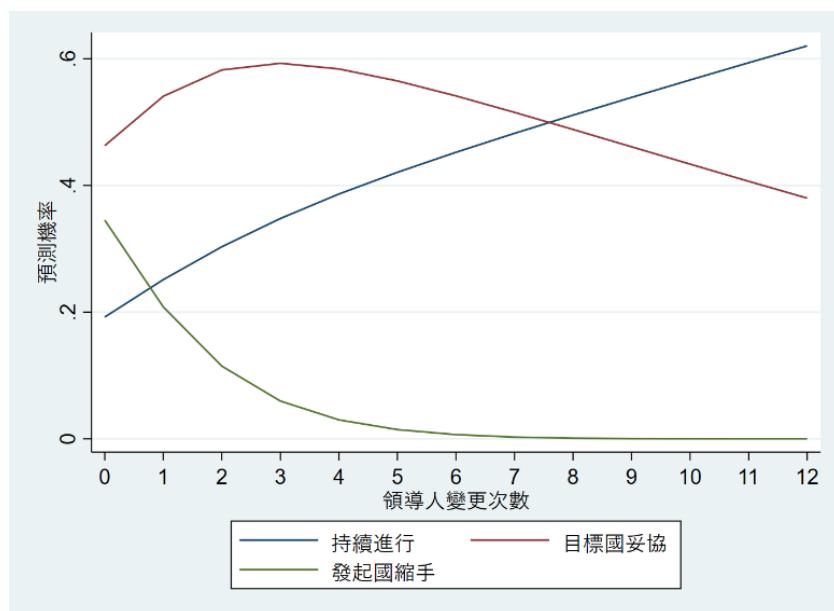


圖 11、發起者政治競爭性預測機率圖

說明：誤差範圍在 95% 信心水準區間，範圍包括變數最大值到最小值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從預測機率方面分析，圖 10 顯示當經濟制裁由歐盟主導時，相較於美國以及其他國際組織，發起者縮手機率較低，符合假設一。圖 11 顯示當發起者政治競爭性越強，發起者選擇縮手機率越低，符合假設二。

除了自變數的影響外，控制變數對制裁結果也有所影響。相對於目標者妥協，本研究發現目標者經濟表現與目標者民主程度對於發起者縮手均有顯著影響，當目標者經濟表現越高時，發起者就越傾向於縮手，符合文獻回顧中的理論研究結果；當目標者民主程度越高時，發起者就越傾向於縮手，不符合先前理論研究的預期。相對於制裁持續進行，本研究發現目標者民主程度同樣對於制裁結果具有顯著性影響，當目標者民主程度越高時，制裁越傾向縮手。

另外，雖然大多數的經濟制裁研究習慣於將制裁結果大致分成制裁持續進行、目標者妥協、發起者縮手三種，但此分類方法本身忽略制裁結果的多樣性，除去雙邊協商、僵持等在各制裁資料庫都佔比甚少的制裁結果種類，目標者部分妥協通常佔據一定比例的制裁結果；以 IST 資料庫為例，目標者部分妥協案件總數為 109，佔所有制裁結果的 27.3%（圖 12）。大多數的研究將目標者部分妥協直接歸類於完全妥協，卻忽略目標者部分妥協並不意味著目標者在制裁中完全失利，若細究目標者部分妥協並非每起都傾向於目標者妥協，目標者可能單就簡單的項目進行妥協，在有關核心利益的項目得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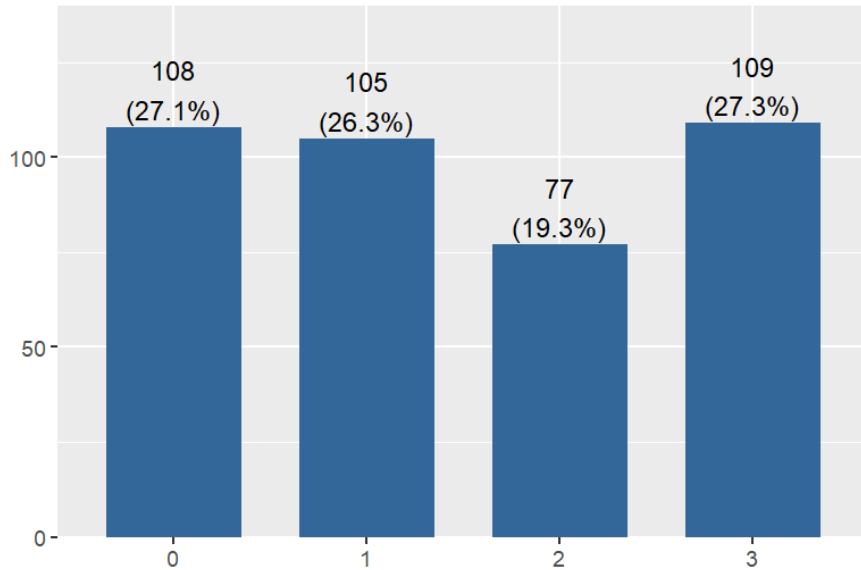


圖 12、四種經濟制裁結果分布

說明：0 是制裁持續進行，1 是目標者完全妥協，2 是發起者縮手，3 是目標者部分妥協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同時鞏固研究假設的論證，本研究針對更加細緻的制裁結果進行更進一步的探討。表 8 呈現的是相對於發起者縮手的經濟制裁結果，依此來重新檢證假設一到三的結果。

表 8、四種經濟制裁結果的 MNL 模型
(以發起者縮手為基準組)



依變數	持續進行	目標者完全妥協	目標者部分妥協
發起者方因素			
歐盟主導 (基準組：美國)			
歐盟	1.905*** (0.738)	1.913*** (0.693)	1.969*** (0.686)
聯合國	0.483 (0.856)	1.214 (0.759)	-0.220 (0.866)
區域性組織	-1.219 (1.579)	1.021 (0.913)	0.724 (0.979)
發起者政治競爭性	1.332*** (0.494)	1.141** (0.460)	0.889** (0.449)
目標者方因素			
目標者軍事上的國家能力	-0.002 (0.126)	-0.332*** (0.124)	-0.071 (0.121)
控制變數			
發起者經濟損失	0.402** (0.191)	0.132 (0.178)	0.248 (0.177)
發起者制裁承諾	0.272 (0.468)	0.468 (0.458)	0.597 (0.454)
目標者經濟表現	0.341 (0.252)	-0.233 (0.245)	-0.576** (0.248)
目標者民主程度	-0.916*** (0.173)	-0.244 (0.161)	-0.461*** (0.159)
目標者政治穩定	-0.623 (0.417)	0.093 (0.338)	-0.369 (0.343)
落日條款	-0.214 (0.611)	-0.079 (0.629)	-0.663 (0.631)
兩國距離	0.831* (0.438)	0.673* (0.375)	0.466 (0.386)
冷戰	-3.051*** (1.128)	-0.324 (0.953)	-0.120 (0.829)
時間	-0.190 (0.117)	-0.341*** (0.132)	-0.098 (0.116)



時間平方	0.002 (0.005)	0.010 (0.008)	-0.004 (0.006)
時間三方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常數	-8.325* (4.814)	2.599 (4.002)	2.113 (4.160)
觀察值 N	311	311	311

說明：^{*}p<0.1; ^{**}p<0.05; ^{***}p<0.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以更細緻的分類重新檢測研究假設，本論文發現自變數歐盟主導、發起者政治競爭性對發起者縮手的影響，符合假設一、二的預期。在目標者軍事上的國家能力方面，在區分出目標者部分妥協後，相較於目標者完全妥協，目標者軍事上的國家能力對發起者縮手的影響顯著性同樣有所提升。

在控制變數方面，相對於目標者完全妥協，目標者經濟表現與目標者民主程度不顯著。相對於目標者部分妥協，兩者對發起者縮手的影響與表 7 相符，由此得知目標者經濟表現與民主程度是在相較於目標者部分妥協的情況下才有影響，而非目標者完全妥協。

第三節 穩定性檢測

本節將針對第二節的統計結果進行穩定性檢測(robunest check)，檢測自變數對依變數的影響是否與本論文主要統計模型 MNL 相符，符合統計的穩定性。本論文所採用檢測穩定性的方法有二，分別是相同資料庫的二元羅吉斯回歸檢測和不同資料庫的 MNL 模型檢測。一方面檢證研究假設在不同模型統計下是否能做出相同結果，一方面檢驗在不同年代、國家的經濟制裁案例中，統計結果是否仍能符合研究假設的預期。

一、二元羅吉斯回歸

本論文採用二元羅吉斯回歸(binary logistic model)檢驗自變數歐盟主導、發起者領導人更替、目標者軍事上的國家能力、發起者成本對發起者縮手的影響，故本論文將發起者縮手設為 1，其他經濟制裁結果一律設為 0，以此檢驗統計結果是否符合研究假設。

使用此模型的好處在於，能更直觀的呈現自變數對依變數的影響，即相較於其他制裁結果，自變數的影響是否導致發起者傾向選擇縮手，而非如 MNL 模型特意設定某一特定經濟制裁種類當作基準組(baseline)；缺點在於，將所有其他不同的制裁結果設為同一類有不符合學理分類的疑慮，過於簡單的分類有可能導致統計結果被其他因素分散與影響。

為了解決粗略分類所帶來的問題，本論文將經濟制裁結果中的持續進行設為遺漏值予以排除，以此便能明確發起者縮手比較的對象（目標者妥協），同時與 MNL 的統計機制更相近。據此，在排除遺漏值後，樣本觀察值數從 311 減為 226，統計結果如表 9 所示。

表 9、兩種經濟制裁結果的 BL 模型

依變數		發起者縮手
發起者方因素		
歐盟主導 (基準組：美國)		
歐盟		-1.879*** (0.652)
聯合國		-0.606 (0.748)
區域性組織		-1.234 (0.927)
發起者政治競爭性		-0.756* (0.404)
目標者方因素		
目標者軍事上的國家能力		0.232** (0.118)
控制變數		
發起者經濟損失		-0.288 (0.195)
發起者制裁承諾		-0.598 (0.428)
目標者經濟表現		0.375* (0.225)
目標者民主程度		0.421*** (0.150)
目標者政治穩定		0.292 (0.324)
落日條款		0.214 (0.592)
冷戰		0.387 (0.758)
兩國距離		-0.542 (0.355)
時間		0.306** (0.130)
時間平方		-0.014



時間三方	(0.009)
常數	0.000
	(0.000)
	-3.903
	(3.825)
觀察值 N	226

說明： $*p<0.1$; $**p<0.05$; $***p<0.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表 9 的呈現中，歐盟主導下的經濟制裁，相較於單一國家，呈負向顯著，符合假設一的預期，與表 7、表 8 的統計結果相同。發起者政治競爭性越高時，發起者會傾向選擇不縮手，為負向顯著影響，符合假設二預期，與表 7、表 8 的統計結果大致相同，但顯著性有所下降。當目標者的國家能力越強時，發起者則越傾向縮手，顯著性相較表 7 有所上升，部分符合假設三預期。總體而言，二元羅吉斯回歸模型的統計結果與 MNL 統計結果相同，進一步證明 MNL 模型的統計結果穩定性。

二、GSDB 資料庫 MNL 模型

本論文採用 GSDB 資料庫來檢測研究假設的廣泛適用性與統計結果的穩定性，GSDB 資料庫於本論文第三章第二節有所介紹，GSDB 資料庫是在眾多資料庫中年代與 IST 資料庫較為相近，且包含以國際組織為主導的經濟制裁的資料庫。此資料庫與 IST 最大的不同點在於，GSDB 資料庫包含美國以外的單一國家經濟制裁，若 GSDB 資料庫的統計結果與 IST 資料庫的統計結果相符，不僅能驗證本論文統計結果的穩定性，更能大幅增加本論文研究假設的解釋力。

GSDB 資料庫的樣本數有 1547 個，年代橫跨 1950-2023 年，由於資料庫本身缺乏發起者制裁承諾、落日條款變數，故控制變數不列入這兩項變數。而此資料的制裁結果分配情形為持續進行佔最大宗，總共 608 件，佔總案件數的 39.3%，原因可能出於資料庫年代新穎，很多制裁皆是近期才開始展開，所以仍在持續進行（見圖 13）。本論文採用 MNL 模型進行統計，結果可見於表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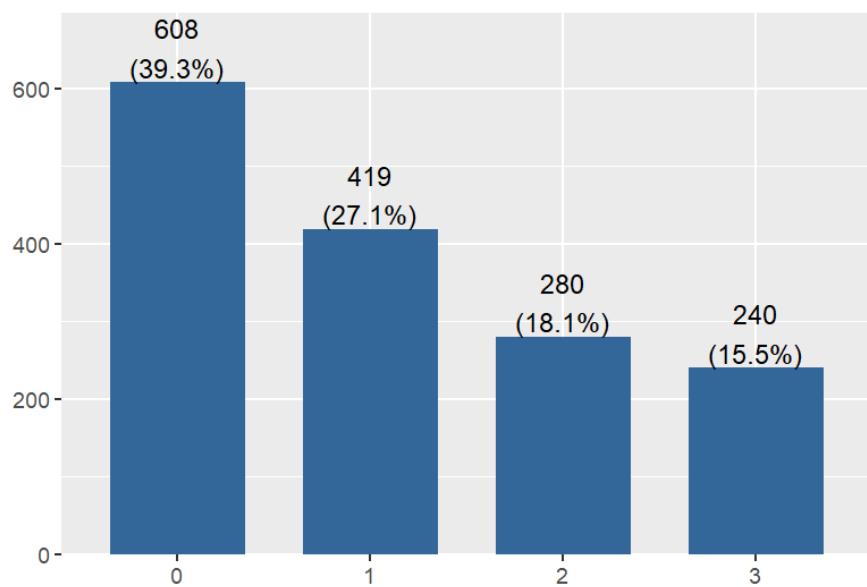


圖 13、GSDB 資料庫四種經濟制裁結果分布

說明：0 是制裁持續進行，1 是目標者完全妥協，2 是發起者縮手，3 是目標者部分妥協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表 10、GSDB 資料庫三種經濟制裁結果的 MNL 模型
(以發起者縮手為基準組)



依變數	持續進行		目標者妥協	
發起者方因素				
歐盟主導 (基準組：美國)				
歐盟	-0.568*	0.032		
	(0.320)	(0.288)		
聯合國	-0.709	0.359		
	(0.512)	(0.447)		
區域性組織	0.329	0.234		
	(0.503)	(0.379)		
發起者政治競爭性	-0.090	0.010		
	(0.073)	(0.053)		
目標者方因素				
目標者軍事上的國家能力	-0.012	-0.021		
	(0.035)	(0.031)		
控制變數				
發起者經濟損失	0.193***	-0.105*		
	(0.068)	(0.058)		
目標者經濟表現	0.612***	-0.100		
	(0.102)	(0.091)		
目標者民主程度	-0.333***	-0.023		
	(0.072)	(0.065)		
目標者政治穩定	0.277	0.445***		
	(0.191)	(0.169)		
冷戰	-4.774***	-0.183		
	(0.592)	(0.218)		
兩國距離	0.314***	0.185*		
	(0.117)	(0.100)		
時間	0.196***	0.055		
	(0.053)	(0.049)		
時間平方	-0.004	-0.002		



	(0.003)	(0.003)
時間三方	0.000	0.000
	(0.000)	(0.000)
常數	-6.157*** (1.307)	0.821 (1.075)
觀察值 N	1093	1093

說明：*p<0.1; **p<0.05; ***p<0.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從表 10 的統計結果可得知，本研究主要的自變數在 GSDB 資料庫中均不顯著，在相對於目標者妥協部分正負號均符合預期，但在相對於持續進行部分僅有歐盟主導符合預期。雖然本論文無法藉由此統計結果宣稱研究假設具有更加廣泛的解釋力，但研究假設仍得到部分支持與驗證。本論文認為之所以會不顯著的原因可能基於資料結構的不同，以及增加許多不同年代與國家的案例所致，此資料庫相較於 IST 資料庫新增 2019-2023 年的經濟制裁案件，大幅增加以持續進行為結果的制裁案件數，進而產生不同的制裁結果分布；在單一國家上增添除了美國之外 79 個不同的發起者，增添不同的行為者影響最終統計結果。

在控制變數部分，目標者經濟表現與目標者民主程度與表 7 正負號皆符合，而且在持續進行部分為顯著，給予表 7 結果部分證據支持。

第四節 分析結果與討論

一、主要研究假設

從歐盟主導分析，本研究發現國際組織中的歐盟相較於單一國家比較不傾向縮手，此統計結果符合假設一的預期。在 Weber and Schneider (2022) 和 Vines (2012) 的觀點中，在聯合國的經濟制裁式微後，歐盟接替聯合國成為主導多邊經濟制裁最主要的國際組織。此假設的成立證實歐盟的組織結構不僅幫助歐盟能夠有效的實施多邊制裁，對目標者造成較高的經濟成本，使得歐盟制裁擁有比較高的效率，更能藉由國際組織間的差異來探討多邊制裁中的背叛行為。

Early and Spice (2015) 的研究證明國際組織間會因為成員多寡而產生背叛行為，當國際組織成員越少時，越不容易產生背叛行為，此研究同時發現其他區域

性組織制裁並沒有與歐盟有同等的成效，卻沒有進行詳述。在本論文的模型同樣證明這點，即其他區域性組織對於發起者縮手行為並無顯著影響，只有歐盟有顯著影響，所以本論文認為並非是國際組織成員國的多寡造成背叛行為的減少，而是歐盟對於成員國高度制度化的管控、懲戒措施，讓歐盟成員國因為經濟與政治成本的考量在實施制裁後選擇合作，制度的成功更讓歐盟的區域領導地位上升，使得即使非歐盟國家也不傾向於做出有違歐盟決議的行為，又更進一步提升其制裁效率(Giumelli, 2019; Cardwell and Moret, 2023)。本論文的統計結果也很好的佐證 Weber and Schneider (2020)的觀點，即歐盟在實施階段制裁的成效比美國高，由於本論文的資料庫年代較新且在依變數的分類上與 Weber and Schneider 有所不同，相較於 Weber and Schneider 利用連續變數(HSE score)作為依變數，更能清晰的呈現歐盟相較於美國經濟制裁結果的型態。

從發起者政治競爭性分析，當發起者政治競爭性越高，發起者越不傾向縮手，符合假設二的預期。過往的研究顯示當發起者領導者更替時，制裁對發起者越不利，因為領導者與執政集團的改變可能會改變國家對於經濟制裁的態度，進而放棄原本的制裁(McGillivray and Stam, 2004; Krustev and Morgan, 2011; Attia et al., 2020)。然而，近期有研究發現領導人會利用實施經濟制裁作為鞏固國內支持的手段，因為實施經濟制裁能為領導人樹立強硬、有能力的形象(Drury, 2001; McLean and Whang, 2014)。本論文統計結果不只為此觀點提供支持，還發現制裁不縮手能讓領導人避免來自內部支持流失所帶來的政治成本，進而使的領導人在政治競爭激烈的環境中得以存活，此解釋不只適用於單一國家，在國際組織亦適用；同時，也能有效的解釋目前西方不放棄經濟制裁的政策趨勢。

從目標者軍事上國家能力分析，當目標者軍事上的國家能力越強時，發起者會越傾向於縮手，此統計結果部分支持假設三的預期。許多過往的研究都較關注於目標者經濟程度、目標者民主程度對於發起者行為的影響；然而，此無法解釋為何像中國、北韓、伊朗等獨裁、共產國家擁有非常高的制裁抵抗能力，過往的研究較多採取案例研究的方式來分析此現象(Attia and Grauvogel, 2019; Chen, 2017)，而本研究則用量化方法證實此論點，從表 7 可看出在控制目標者經濟和民主程度的情況下，目標者軍事上國家能力依舊顯著，表示目標者對經濟成本的

承受能力會顯著影響發起者的決策。表 8 中更能明確看出目標者軍事上的國家能力僅在相對於目標者完全妥協的情況下，顯著的影響縮手行為，可能表示獨裁、威權的國家在面對制裁時會憑藉著國家能力選擇完全不妥協，所以發起者不得不縮手。而民主程度高的目標者在面對制裁時，會藉由部分不妥協的方式，促使發起者縮手。

二、其他因素

從表 7 的結果可看出，當目標者民主程度越高時，發起者越傾向縮手。此結果與先前目標者的民主程度與制裁結果相關的研究不同，即民主國家由於會承受比較高的民生經濟、選舉壓力，容易對經濟制裁妥協(Attia et al., 2020; Biglaiser and Lektzian, 2011)。目標者民主程度對制裁結果的影響不符合先前理論研究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民主程度與經濟表現間具有連動關係，因為通常民主程度越高的國家，其經濟表現就會越好，過去理論顯示目標者經濟表現越好就越不容易妥協，故民主國家較有能力抵抗經濟制裁造成的成本，民意不會輕易被制裁所影響，使的發起者傾向於縮手。二、民主程度高的國家有高機率是發起者的重要夥伴或盟友，有研究發現當發起者與目標者是盟友關係時，發起者會為了維繫與目標者間的長期關係而瞻前顧後，比較傾向於縮手(Nooruddin, 2002)，而此論點同時也能解釋經濟制裁結果傾向於不持續的原因。另外，目標者的經濟表現則與以往研究結果相同，即當目標者經濟表現越好時，目標者的抵抗能力越高，越不傾向與妥協，而從發起者的面向來看，即傾向於縮手(Barber, 1979; Hufbauer et al., 1990)。

有趣的是，這兩個控制變數在表 8 中得到更細緻的解釋。相對於持續進行的統計結果與表 7 相符，相對於目標者完全妥協並不顯著，相對於目標者部分妥協的統計結果則與表 7 相符，表示當目標者經濟或民主程度越高時，越會傾向部分不妥協，來促使發起者縮手，本論文認為因為盟友雙方皆不想讓經濟制裁破壞雙方長期關係，故傾向運用議價(bargain)的方式來解決爭端，即雙方在面對爭端時選擇各退一步，發起者容許目標者在選擇不達成部分要求的情形下，放棄繼續制裁目標者。

第六章 結論

經濟制裁是國際政治經濟領域長期以來所關注的議題，尤其在 2016 年川普上任以來，隨著美中貿易戰的開打，再次吸引學界的關注，像 2020 年的俄烏戰爭、2020 年中美科技戰都能看見經濟制裁的身影，經濟制裁已經成為現代國際衝突中不可或缺的手段。

歷來經濟制裁相關的研究都圍繞著經濟制裁的效率以及什麼因素會導致目標者選擇妥協，卻較少關注什麼因素會導致發起者縮手，然而依據近期經濟制裁資料庫的統計，發起者縮手其實佔經濟制裁結果總體 15-30% (Attia and Grauvogel, 2023; Morgan et al., 2014, Felbermayr et al., 2020)。本論文認為當發起者發動經濟制裁勢必會付出一定程度的成本，同時發起者高機率在經濟實力上比目標者還要強大，為什麼經濟制裁發起者要縮手？什麼因素導致發起者選擇縮手？本論文針對研究問題採以量化方法進行研究，發現歐盟主導、發起者政治競爭性、發起者成本、目標者國家能力會影響發起者縮手行為。

第一節 主要研究發現與貢獻

本論文使用 IST 資料庫做為研究資料來源，並採用量化研究法中的無序多分類羅吉斯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 MNL)作為主要模型，再搭配不同的依變數分類方法、模型、資料庫資料檢測統計結果穩健性。

首先，本研究發現當發起者為歐盟時，相較單一國家，發起者會傾向於不縮手，而此發現符合本論文假設一。歷來有關於國際組織參與制裁的研究指出，多邊制裁中若有國際組織參與，會有效克服背叛或搭便車行為，發揮出多邊制裁優勢，讓經濟制裁的效率會增加，使目標者選擇妥協(Abbott and Snidal, 1998; Drezner, 2000; Keohane and Martin, 1995; Schweller and Priess, 1997)。然而，之前的研究多集中在國際組織參與的情形，而非主導的情況，同時將國際組織視為整體，沒有去細分是什麼樣的國際組織能有效阻止背叛行為，實際上並非所有國際組織主導的制裁，效率都能高過單一國家。

本論文統計結果顯示，歐盟以外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非洲聯盟等區域組織，相較於單一國家，對於發起者縮手行為都沒有顯著影

響，表示並非國際組織都能讓多邊制裁的優勢得以發揮，而是特定的國際組織才能藉由組織的統合來約束成員國行為，從而讓制裁成效發揮。此論點符合 Vines (2012)和 Giumelli (2019)的觀點，歐盟是繼聯合國後最多實施經濟制裁的組織，歐盟經濟制裁有效的彌補聯合國制裁成效不彰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而歐盟內部本身的監督與懲處機制所帶來的政治、經濟成本是歐盟能約束成員國背叛、搭便車行為的主因，歐盟在歐洲的主導地位也促使其他非成員國遵從其制裁決議。

再者，本研究發現當發起者政治競爭性越高，發起者越傾向不縮手，符合假設二。許多先前的研究指出當發起者的政治競爭導致國家領導者更替時，由於領袖的更替導致政策的轉變，發起者便越會傾向於縮手(McGillivray and Stam, 2004; Attia et al., 2020)。然而，本論文統計結果顯示發起者領導者更替反而會造成發起者傾向不縮手，因為不縮手不只能讓民眾認為領導者較積極處理對外事務，同時能為領袖樹立強硬、有能力的形象，利於鞏固國內支持，不用承受來自內部支持者所帶來的政治成本。此研究結果有別於既往政治競爭性對制裁結果影響的認知，也更能有效解釋經濟制裁在近年被廣泛運用的現象。

第三，本研究統計結果部分符合假設三的預期，當目標者的軍事上國家能力越強，發起者越傾向於縮手。由於本論文認為歷來目標者經濟與目標者妥協行為間的研究無法有效解釋中國、北韓、伊朗等獨裁國家能有效抵抗經濟制裁的原因，故使用國家軍事能力來當作國家能力的測量指標，來檢測上述國家是否能在經濟不佳的前提下，依靠國家分配、汲取資源的能力有效對抗經濟制裁。統計結果顯示，在控制目標者經濟表現、民主程度的前提下，相對於目標者完全妥協，目標者軍事上的國家能力能有效幫助目標者對抗經濟制裁帶來的壓力，成功讓經濟制裁的成效不如預期，發起者在認知到制裁所帶來的經濟成本不足以改變目標者的行為且自己還在不斷付出成本執行制裁後，便會傾向於選擇縮手。

本論文最大的貢獻在於解釋成本對於發起者縮手行為的影響，不同於成本對於制裁結果影響的傳統解釋途徑，本研究以發起者間合作與發起者內部的視角來詮釋成本對於縮手行為的影響。本研究發現當歐盟領導制裁時，由於歐盟內部具有嚴謹的監督與懲處制度，對於經濟與政治成本的預期會讓成員國間選擇合作，發起者所考量的成本不僅來源於制裁實施本身，亦來源於他國或國際組織所帶來

壓力。另外，本研究也聚焦於放棄制裁所帶來的政治成本，發起者內部的政治成本成為影響發起者縮手行為的關鍵因素，此解釋途徑亦能解釋近年來西方世界對於制裁縮手行為的趨勢。上述研究發現皆是之前相關研究所忽略，但卻是解釋現今制裁縮手行為的重要因素。

本論文不僅在理論、經驗研究上補充既有研究的不足，在資料上亦使用較新的制裁資料庫，使得研究結果較符合近期的國際趨勢，增加研究發現對於當前國際事件的解釋力；同時，增加國際組織制裁的相關研究，為多邊制裁與單一制裁效率比較增添更為細緻的解釋。本研究對於依變數採取較為精細的處理，相較於過往二元式的制裁結果，本論文將依變數分為三類與四類，準確的概括制裁可能會出現的結果；如此，研究者就能針對自變數對於各結果的影響進行比較，釐清其中的影響機制。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論文主要的研究限制有二，分別是解釋力不足、因果機制，並對此提出未來研究建議。

首先是解釋力不足，由於本論文採用 IST 資料庫中的行為者只包含美國、歐盟、聯合國、區域性組織，大部分的制裁主導國仍侷限在西方國家，所以本論文理論建構在非西方國家可能有所侷限。在其他單一國家方面，本論文雖然嘗試使用 GSDB 資料庫來彌補 IST 資料庫在其他單一國家制裁蒐集上的缺乏，但結果並不顯著。本論文認為年代和行為者差異是其中關鍵，經濟制裁的資料庫年代過新可能會讓大部分的制裁仍在進行中，影響依變數的分布，統計結果也可能出於經濟制裁案件蒐集上的差異或經濟制裁結果判定上的不同導致統計結果有異，所以本論文的研究發現解釋力僅限在發起者是美國、歐盟、聯合國、區域組織的經濟制裁案件中。另外，即使文章假設的統計結果都出現顯著，仍可能面臨因果機制無法論證的挑戰，無法完全確定自變數對依變數的影響機制符合文章中的推論。

未來的建議的研究方向有二：一、年代過新導致依變數分布有誤的問題，可以等此時期的經濟制裁結果已定後再重新驗證相關的研究假說，藉此排除過多制

裁持續進行中的制裁結果。二、非西方行為者方面的問題，近期已有學者針對中國這樣有實施經濟制裁卻非民主國家的案例，建立專屬的經濟制裁資料庫(Zhang and Shanks, 2024)，可以利用相同的模型與變數去檢測該資料庫，藉此檢驗是否非西方國家的制裁行為符合西方國家的邏輯。

再者是因果機制方面的限制，本論文雖然透過實證研究發現自變數對依變數的顯著影響，並且經由過往文獻討論來建立因果機制，但仍缺乏以實證的方式來佐證其中的因果機制。現今許多嚴謹的量化研究不僅藉由文獻回顧建立因果機制、設立研究假設，更透過中介變數或干擾變數的設立證明因果機制。另外，在發起者內部競爭性的測量上，由於民主國家與國際組織的領袖有任期限制，依據領袖更替次數來衡量政治競爭性雖然能部分解釋，但是仍缺乏對於黨派因素、任期因素的考量。

建議未來的研究方向可以朝此方向努力，透過設立中介變數佐證其中的因果機制，同時為發起者內部政治競爭性建立更有說服力、全面的測量方式，並以此為目標建立相關的經濟制裁資料庫。同時，針對國際組織與單一國家在面對高度內部競爭性時會出現的反應進行深入的分析與比較，釐清其中的影響。

經濟制裁在國家競爭的角力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期許未來相關的研究可以朝更總體性的方向發展，尋找出更具廣泛解釋力(generalized)的變數；同時，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經濟制裁內容也朝針對性的高科技、創新產品發展，這類型制裁究竟會造成國際格局出現什麼樣的變化成為國關領域重要的研究主題。我國目前處於中美經濟制裁前線，兩岸若發生衝突，台灣高機率成為經濟制裁目標者，什麼樣的因素會使得中美大國選擇放棄制裁將是決策考慮重點，期許未來有更多研究投入其中，提供給吾人更多政策啟示。

參考資料



一、中文資料

黃紀、王德育，（2012）。《質變數與受限依變數的迴歸分析》，台北：五南圖書。

薛健吾，（2021）。〈目標者的全球化程度對經濟制裁結果的影響，1992～2005〉，《臺灣政治學刊》，25(1)，51-95。

蘇翊豪，（2022）。〈美國針對性制裁中國大陸廠商的聽眾成本：訊號理論的剖析〉，《政治科學論叢》，(91)，1-47。

BBC，（2016）。〈歐盟委員會批准與古巴政治對話合作協議〉，BBC News 中文，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6/09/160922_cuba_eu_pdca。

二、英文資料

Abbott, K. W., and Snidal, D. (1998). Why States Act through Form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2(1), 3–32.

Abdel Aziz, G. A. (2019). The Saudi–US Alliance challenges and resilience, 2011: 2019.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8(3), 208–225.
<https://doi.org/10.1108/REPS-04-2019-0057>

Adam, A., and Tsarsitalidou, S. (2019). Do sanctions lead to a decline in civil liberties? *Public Choice*, 180(3), 191–215.

Aggarwal, V. K., and Reddie, A. W. (2020). New Economic Statecraft: Industrial Policy in an Era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Issues and Studies*, 56(2), 1–29.

Ahn, D. P., and Ludema, R. D. (2020). The sword and the shield: The economics of targeted sanction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30, 1-21.

Allen, S. H. (2008). The Domestic Political Costs of Economic Sanct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2(6), 916-944.

Andrews, M., Pritchett, L., and Woolcock, M. (2017). *Building State Capability: Evidence, Analysis, A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tia, H. (2024). Divert when it does not hurt: The initiation of economic sanctions by US presidents from 1989 to 2015.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2(1), 109–131. <https://doi.org/10.1111/roie.12704>

Attia, H., and Grauvogel, J. (2019). *Easier In Than Out: The Protracted Process of Ending Sanctions*. GIGA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Attia, H., and Grauvogel, J. (2023).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Termination, 1990–2018: Introducing the IST datase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60(4), 709–719.

Attia, H., Grauvogel, J., and Von Soest, C. (2020). The term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Explaining target compliance and sender capitulatio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29, 2–12.

Baldwin, D. (1971). The Power of Positive Sanctions. *World Politics*, 24(1), 19–38.

Baldwin, D. (1985). *Economic statecraf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aldwin, D. (1998). Evaluating Economic Sanc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2), 189–198.

Baldwin, D. (2000). The Sanctions Debate and the Logic of Choi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3), 80–107.

Bapat, N., and Morgan, T. C. (2009). Multilateral versus Unilateral Sanctions Reconsidered: A Test Using New Dat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3(4), 1075–1094.

Barbara, C. (1995, December 1). Iraq sanctions kill children, UN reports. *New York Times*.

Barber, J. (1979). Economic Sanctions as a Policy Instrume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55(3), 367–384.

BBC. (2018, July 10). Why the end of US sanctions hasn't helped Sudan. BBC.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frica-44711355>

Beckley, M. (2018). The Power of Nations: Measuring What Matt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3(2), 7–44.

Besley, T., and Persson, T. (2008). Wars and State Capacity.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6(2–3), 522–530.

Besley, T., and Persson, T. (2009). The Origins of State Capacity: Property Rights, Taxation, and Polit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9(4), 1218–1244.

Biersteker, T. J. (2015). UN Targeted Sanctions as Signals: Naming and Shaming or Naming and Stigmatizing? In *The Politics of Levera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me, Shame, and Sanction* (pp. 165–184). Palgrave Macmillan.

Biersteker, T. J., and Hudáková, Z. (2021). UN targeted sanction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challenges.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Economic Sanctions* (pp. 107–124).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https://www.elgaronline.com/edcollchap/edcoll/9781839102714/9781839102714.00011.xml>

Biersteker, T. J., Eckert, S. E., and Tourinho, M. (2016). *Targeted Sanc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iersteker, T. J., Eckert, S. E., Tourinho, M., and Hudáková, Z. (2018). UN targeted sanctions datasets (1991–2013).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5(3), 404–412.

Biersteker, T., and Portela, C. (2022). *EU sanctions in context: Three types*.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Biglaiser, G., and Lektzian, D. (2011). The Effect of Sanctions on U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5(3), 531–551.

Bolks, S. M., and Al-Sowayel, D. (2000). How Long Do Economic Sanctions Last? Examining the Sanctioning Process through Duration.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3(2), 241–265.

Brownlee, J. (2012). *Democracy Prevention: The Politics of the U.S.-Egyptian Alli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stikova, L., and Corduneanu-Huci, C. (2017). Patronage, Trust, and State Capacity: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ies of Clientelism. *World Politics*, 69(2), 277–326.

Cárdenas, M. (2010). State Capacity in Latin America. *Economía*, 10(2), 1–45.

Cardwell, P. J., and Moret, E. (2023). The EU, sanctions and regional leadership. *European Security*, 32(1), 1–21.

Carter, B. (1987).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 Improving the Haphazard U.S. Legal Regime*. California Law Review.

Charron, A. (2011). *UN Sanctions and Conflict: Responding to Peace and Security Threats*. Routledge.

Chen, J. (2017). Why Economic Sanctions on North Korea Fail to Work ? *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3(4), 513–534.

Chenoweth, E., and Stephan, M. J. (2011).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heung, T. M. (2017). *US–China Military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and the Making of Chinese Weapon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Plans* (No. Series 9). SITC Research Briefs.

Clark, D., and Regan, P. (2022). *Mass Mobilization Protest Data* (Version 5.1) [Dataset]. Harvard Dataverse. <https://doi.org/10.7910/DVN/HTTWYL>

Cortright, D., and Lopez, G. (2000). *The Sanctions Decade: Assessing UN Strategies in the 1990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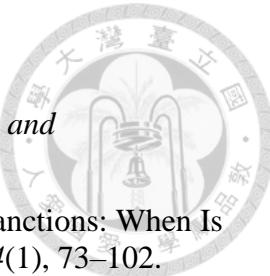
Dafoe, A., Hatz, S., and Zhang, B. (2021). Coercion and Provoc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5(2–3), 372–402.

Dincecco, M., Fenske, J., and Onorato, M. (2019). Is Africa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flict and state development. *Economic History of Developing Regions*, 34(2), 209–250.

Dorussen, H., and Mo, J. (2001). Ending economic sanctions: Audience costs and rent-seeking as commitment strategi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5(4), 395–426.

Doxey, M. (1972).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UN and Southern Afric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6(3), 527–550.

Drezner, D. W. (1998). Conflict Expectations and the Paradox of Economic Coercion.



- Drezner, D. W. (1999). *The Sanctions Paradox: Economic Statecraf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 Press.
- Drezner, D. W. (2000). Bargaining, Enforcement, and Multilateral Sanctions: When Is Cooperation Counterproductiv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4(1), 73–102.
<https://doi.org/10.1162/002081800551127>
- Drezner, D. W. (2011). Sanctions Sometimes Smart: Targeted Sanction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3(1), 96–108.
- Drezner, D. W. (2019). Economic Statecraft in the Age of Trump.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42(3), 7–24. <https://doi.org/10.1080/0163660X.2019.1663072>
- Drezner, D. W. (2022). How not to sanc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98(5), 1533–1552.
- Drury, A. C. (2001). Sanctions as Coercive Diplomacy: The U.S. President's Decision to Initiate Economic Sanction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4(3), 485–508. <https://doi.org/10.1177/106591290105400301>
- Dursun, P., and Drury, C. (2010). Coercive or corrosiv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economic sanctions on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36(3), 240–264.
- Early, B. (2015). *Busted Sanctions: Explaining Why Economic Sanctions Fail*. Stanford Univ. Press.
- Early, B. (2021). Making Sanctions Work: Promoting Compliance, Punishing Violations, and Discouraging Sanctions Busting.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Economic Sanctions* (pp. 167–186).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Early, B. R. (2011). Unmasking the Black Knights: Sanctions Busters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Success of Economic Sanction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7, 381–402.
- Early, B. R. (2012). Alliances and Trade with Sanctioned States: A Study of U.S. Economic Sanctions, 1950–2000.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6(3), 547–572.
<https://doi.org/10.1177/0022002711420961>
- Early, B., and Spice, R. (2015). Economic Sanction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anctions Busters: When Does Institutionalized Cooperation Help Sanctioning Effort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11(3), 339–360.
- EU Concil. (2011, April 9). Proposal for a COUNCIL DECISION concerning the conclusion of consultations with the Republic of Guinea Bissau under Article 96 of the Cotonou Agreement. EU Concil.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52011PC0409&qid=1743244611563>
- EU Concil. (2015, March 24). COUNCIL DECISION (EU) 2015/ 541—Of 24 March 2015—Repealing Decision 2011/ 492/ EU concerning the conclusion of consultations with the Republic of Guinea-Bissau under Article 96 of the ACP-EU Partnership

Agreement. EU Concil.

European Commission. (2003). Declaration by the Presidency, on behalf of the European Union, on Cuba [Text].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pesc_03_65

European Commission. (2011, July 8). European Union sets out roadmap for the gradual resumption of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with Guinea-Bissau [Text].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11_896

Farmer, R. D. (2000). Costs of economic sanctions to the sender. *World Economy*, 23(1), 93–117.

Farrell, H., and Newman, A. L. (2019).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4(1), 42–79.

Fearon, J. D. (1995).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3), 379–414.

Fearon, J. D., and Laitin, D. D. (2003).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1), 75–90.

Felbermayr, G., Kirilakha, A., Syropoulos, C., Yalcin, E., and Yotov, Y. V. (2020). The global sanctions data bas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29, 103561.
<https://doi.org/10.1016/j.eurocorev.2020.103561>

Forrer, J. (2018). *Secondary economic sanctions: Effective policy or risky business*. Atlantic Council.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issue-brief/secondary-economic-sanctions-effective-policy-or-risky-business/>

Freedom House. (2024). *Freedom in the World* [Dataset]. Freedom House.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

Fukuyama, F. (2013). What Is Governance? *Governance*, 26(3), 347–368.
<https://doi.org/10.1111/gove.12035>

Fukuyama, F. (2014).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Galtung, J. (1967). On th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 with examples from the case of Rhodesia. *World Politics*, 19(3), 378–416.

Giumelli, F. (2019). Implementation of sanctions. In *Economic Sanctions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Practice* (pp. 116–135). Routledge.

Giumelli, F., Hoffmann, F., and Książczakowá, A. (2021). The when, what, where and why of European Union sanctions. *European Security*, 30(1), 1–23.
<https://doi.org/10.1080/09662839.2020.1797685>

Gottfried, M. S., and Trager, R. F. (2016). A Preference for War: How Fairness and Rhetoric Influence Leadership Incentives in Cris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60(2), 243–257. <https://doi.org/10.1093/isq/sqv025>

Grauvogel, J., and Attia, H. (2020). *How do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end? Towards a process-oriented, relational, and signalling perspective* (No. 320). GIGA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Grossman, G., Manekin, D., and Margalit, Y. (2018). How Sanctions Affect Public Opinion in Target Countries: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Israel.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1(14), 1823–1857.
<https://doi.org/10.1177/0010414018774370>

Held, D. (199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 In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pp. 71–126). The Open University.

Hufbauer, G. C., Jeffrey, S., and Kimberly, A. E. (1990). *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 History and current policy*. Peterson Institute.

Jena, D., Akash, C., and Gupta, P. (2024). Deflecting economic sanctions: Do trade and political alliances matte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21(3), 543–567. <https://doi.org/10.1007/s10368-024-00616-w>

Kaempfer, W. H., and Lowenberg, A. D. (1999). Unilateral Versus 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A Public Choice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3(1), 37–58. <https://doi.org/10.1111/0020-8833.00110>

Kennedy, A. B., and Lim, D. J. (2018). The innovation imperative: Technology and US–China rival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Affairs*, 94(3), 553–572.

Keohane, R. O., and Martin, L. L. (1995). 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 39–51.

Kreps, D., and Shepsle, K. A. (1990). Corporate Culture and Economic Theory. In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pp. 90–14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rustev, V. L., and Morgan, T. C. (2011). Ending Economic Coerc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28(4), 351–376. <https://doi.org/10.1177/0738894211413057>

Leeds, B. A. (2020).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atop) codebook*. Rice University. <http://atop.rice.edu/home>

Lektzian, D., and Biglaiser, G. (2013). Investment, Opportunity, and Risk: Do US Sanctions Deter or Encourage Global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7(1), 65–78.

Lektzian, D., and Souva, M. (2009).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Sanctions Onset and Succes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1(6), 848–871.

Li, Z., and Li, T. (2022). Economic Sanction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Evidence from Sanctions on Russia. *Sustainability*, 14(10), 6112.

Lindsay, J. M. (1986). Trade Sanctions As Policy Instruments: A Re-Examin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0(2), 153–173.

- Liou, R. Y.-L. (2024). Mass Mobilization, Elite Competition, and Diversionary Use of Sanction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20(4), orae025.
- Lori, B., Gallant, N., and Nossal, K. R. (1998). Sanctions as a gendered instrument of statecraft: The case of Iraq.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4(1), 69–84.
- Lucena, C., and Apolinário Jr, L. (2016). Targeted Versus Conven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 What Is at Stake for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42(4), 565–589.
- Major, S. (2012). Timing Is Everything: Economic Sanctions, Regime Type, and Domestic Instability.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38(1), 79–110.
- Mann, M. (1984).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 25(2), 185–213.
- Mann, M. (2008). Infrastructural Power Revisited.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43(3), 355–365.
- Marinov, N. (2005). Do Economic Sanctions Destabilize Country Leader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9(3), 564–576.
- Mayer, T., and Zignago, S. (2012). *CEPII's Distances Measures: The GeoDist Database* [Dataset]. CEPII Working Paper 2011-25. https://www.cepii.fr/CEPII/en/bdd_modele/bdd_modele_item.asp?id=6
- McGillivray, F., and Stam, C. A. (2004). Political institutions, coercive diplomacy, and the duration of economic sanct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8(2), 154–172.
- McLean, E. V., and Whang, T. (2014). Designing foreign policy: Voters,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and economic sanction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1(5), 589–602.
- Morgan, T. C., and Schwebach, V. L. (1997). Fools Suffer Gladly: The Use of Economic Sanctions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1(1), 27–50.
- Morgan, T. C., Bapat, N., and Kobayashi, Y. (2014). Threat and imposition of economic sanctions 1945–2005: Updating the TIES dataset.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31(5), 541–558.
- Morgan, T. C., Syropoulos, C., and Yotov, Y. V. (2023). Economic Sanctions: Evolution, Consequences, and Challeng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7(1), 3–29.
- Nephew, R. (2018). The hard part: The art of sanctions relief. *Washington Quarterly*, 41(2), 63–77.
- Nooruddin, I. (2002). Modeling Selection Bias in Studies of Sanctions Efficacy.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28(1), 59–75.
- O'Reilly, C., and Murphy, R. H. (2022). An Index Measuring State Capacity, 1789–

2018. *Economica*, 89(355), 713–745.
- Onder, M. (2020). Regime Type, Issue Type and Economic Sanctions: The Role of Domestic Players. *Economies*, 8(1), Article 1.
- Oxenstierna, S., and Olsson, P. (2015). *The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Impact and Prospect of Success*. FOI.
- Pape, R. A. (1997). Why Economic Sanctions Do Not Wor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2(2), 90–136.
- Pape, R. A. (1998). Why Economic Sanctions Still Do Not Wor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1), 66–77.
- Peksen, D. (2017). Autocracies and Economic Sanctions: The Divergent Impact of Authoritarian Regime Type on Sanctions Success.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30(3), 253–268.
- Peksen, D. (2019). When Do Imposed Economic Sanctions Work –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Sanctions Effectiveness Literature.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60(3), 635–647.
- Peksen, D., and Jeong, J. (2019). Domestic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Veto Players, and Sanction 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3(2), 194–217.
- Peksen, D., and Peterson, T. (2016). Sanctions and Alternate Markets How Trade and Alliances Affect the Onset of Economic Coercion.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69(1), 4–16.
- Portela, C. (2012). *European Union Sanc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When and Why do they Work?* Routledge.
- Portela, C., and Charron, A. (2022). The Evolution of Databases in the Age of Targeted Sanc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5(1), viac061.
- Powell, J. M., and Thyne, C. L. (2011). Global instances of coups from 1950 to 2010: A new datase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8(2), 249–259.
- Pritchett, L. (2022). National development delivers: And how! And how? *Economic Modelling*, 107, 105717.
- Quek, K. (2021). Four Costly Signaling Mechanism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5(2), 537–549.
- Rosenberg, E., Goldman, Z. K., Drezner, D., and Solomon-Strauss, J. (2016). *The New Tools of Economic Warfare: Effects and Effectiveness of Contemporary U.S. Financial Sanctions*.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 Schelling, T. C. (1984). *Choice and consequ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chott, J. (2023).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How effective? How durabl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olicy Brief*, 23(3).
- Schreiber, A. P. (1973). Economic coercion as an instrument of foreign policy: US economic measures against Cuba and the Dominican Republic. *World Politics*,



25(3), 387–413.

Schweller, R. L., and Priess, D. (1997). A Tale of Two Realisms: Expanding the Institutions Debate.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41(Supplement_1), 1–32.

Skocpol, T. (1997).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In *Policy Process* (2nd ed.). Routledge.

Sobek, D., and Thies, C. G. (2015). Civil Wars and Contemporary State Building: Rebellion, Conflict Duration, and Lootable Resources. *Civil Wars*, 17(1), 51–69.

Soifer, H. (2008). State Infrastructural Power: Approaches to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43(3), 231–251.

Stephens, S. (2014). The EU has recognized that its Common Position has failed to improve human rights in Cuba. It's time for the U.S. to do the same with its embargo. *Americas Quarterly*.

<https://www.americasquarterly.org/fulltextarticle/the-eu-has-recognized-that-its-common-position-has-failed-to-improve-human-rights-in-cuba-its-time-for-the-u-s-to-do-the-same-with-its-embargo/>

Suryanarayan, P. (2024). Endogenous State Capacit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7(Volume 27, 2024), 223–243.

The Brussels Times. (2015, May 1). 5 of the largest EU scandals in our history. The Brussels Times.

<https://www.brusselstimes.com/32741/5-of-the-largest-eu-scandals-in-our-history>

Teorell, J. (2010). *Determinants of Democratization: Explaining Regime Change in the World, 1972–200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1, April 8). Guinea-Bissau 2010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9-2017.state.gov/j/drl/rls/hrrpt/2010/af/154351.htm](http://2009-2017.state.gov/j/drl/rls/hrrpt/2010/af/154351.htm)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2022). *Per capita GDP at current prices—US dollars* [Dataset]. United Nations Data.
<https://data.un.org/Data.aspx?q=GDPandd=SNAAMAandf=grID%3a101%3bcurID%3aUSD%3bpcFlag%3a1>

Van Bergeijk, P. A., and Siddiquee, M. S. (2017). Biased sanctions? Methodological change in 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 and its im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43(5), 879–893.

Vines, A. (2012). The effectiveness of UN and EU sanctions: Lesson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Affairs*, 88(4), 867–877.

Von Soest, C., and Wahman, M. (2015). Not all dictators are equal: Coups, fraudulent elections, and the selective targeting of democratic sanction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2(1), 17–31. <https://doi.org/10.1177/0022343314551081>

Walentek, D., Broere, J., Cinelli, M., Dekker, M., and Haslbeck, J. (2021). Success of

economic sanctions threats: Coercion, information and commitment.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47(3), 417–448.

Wallensteen, P., Staibano, C., and Eriksson, M. (2003). *Making targeted sanctions effective: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UN policy options*. Department of Peace and Conflict Research.

Wang P., and Yan X. (2020). Bureaucratic Slack in China: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and the Decline of Patronage Networks in Developing Local Economies. *The China Quarterly*, 243, 611–634.
<https://doi.org/10.1017/S0305741019001504>

Weber, M. (1964). Bureaucracy. In *From Max Weber* (pp. 196–244). Oxford Univ. Press.

Weber, P. M., and Schneider, G. (2022). Post-Cold War sanctioning by the EU, the UN, and the US: Introducing the EUSANCT Dataset.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39(1), 97–114. <https://doi.org/10.1177/0738894220948729>

Weber, P. M., and Schneider, G. (2020). How many hands to make sanctions work? Comparing EU and US sanctioning effort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03, 103595.

Weiss, J. C. (2013). Authoritarian Signaling, Mass Audiences, and Nationalist Protest in Chin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7(1), 1–35.
<https://doi.org/10.1017/S0020818312000380>

Whang, T. (2010). Structural Estimation of Economic Sanctions: From Initiation to Outcom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7(5), 561–573.

Whang, T., McLean, E., and Kuberski, D. (2013). Coercion, information, and the success of sanction threa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7(1), 65–81.

Williams M. J. (2021). Beyond state capacity: Bureaucratic performance,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reform.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17(2), 339–357.

World Bank. (2024). Military expenditure (current USD). World Bank Open Data.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MS.MIL.XPND.CD>

Yalcin, E., Felbermayr, G., Kariem, H., Kirilakha, A., Kwon, O., Syropoulos, C., and Yotov, Y. V. (2025). The Global Sanctions Data Base—Release 4: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the Sanctions on Russia. *The World Economy*.

Zarpli, O. (2023). When Do Imposed Sanctions Work? The Role of Target Regime Typ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7(7–8), 1482–1509.

Zhang, J. J., and Shanks, S. (2024). Measuring Chinese economic sanctions 1949–2020: Introducing the China TIES dataset.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42(3), 1–25.

